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每份售六百元・

創刊號

專論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王芸生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論知行　馮友蘭

特稿連載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華盛頓通信

糧食的國際分配　陳之邁

觀察通信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李聞之死（昆明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沉默中的潘光旦（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三版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水・人物・藝術　卞之琳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民治紡織染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毛線　毛呢　毛毯　毛絨

總公司：重慶林森路五十號

廠址：重慶沙坪壩 高家花園二十九號

辦事處：上海九江路二八〇號 和成銀行大樓二樓三室

永生錢莊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地址：重慶陝西路

電話：四一五六三

電報掛號　五四四五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本廠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第一期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甘青甯總經銷：蘭州鳴遠文化社 蘭州中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徵求各地同業批銷或總經售）

本期作者

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蔡維藩：南開大學教授
馮友蘭：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陳之邁：中國駐美大使館參事
卞之琳：南開大學教授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編者

一

本刊籌備多月，歷經艱苦，終於今日問世。創刊伊始，茲謹一述我們出版這一個刊物的志趣、風度和立場。

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盪，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全國人民，無不陷入苦悶憂懼之境。在這種局面下，工商百業，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業所遇的困難，尤其一言難盡。言路狹窄，放言論事，處處顧忌；交通阻塞，發行推銷，備受限制；物價騰漲，印刷成本，難於負担；而由於多年並多種原因所造成的彌漫於全國的那種麻痺、消沉、不求長進的風氣，常常使一個有尊嚴有內容的刊物，有時竟不能獲得廣多的讀者。在這樣一個出版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們甘受艱苦，安於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懼、甚至失敗，仍欲出而創辦這個刊物，此不僅因為我們具有理想，具有熱忱，亦因我們深感在今日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嚴肅的言論，以挽救國運，振奮人心。

我們感到現在大多數人祇知追逐權勢；追逐利慾；人人以一己為先，國家的禍福竟成為末要而少人過問。是非不明，正氣不張。許多人常在一種衝動下，流露他們愛國的情緒；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現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盡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但要抗禦外敵，自强圖存，顯非單憑感情所能濟事；而建設國家，改革社會，尤需有衆多的能夠咬得緊牙關、站得住腳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環顧海內，種種現狀，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來日，尤使人不勝疑懼憂慮。在這樣一個混沌悲痛的歷史中，有志之士，實應挺身而出，不顧一己的得失毀譽，盡其天良，以造福於他所屬的國家。這誠然是一個充滿着禍亂災難的痛苦時代，但這也是一個大足以鍛鍊我們的意志和情操的時代。

我們這個刊物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動機則無不出於至誠。這個刊物確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決不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刊物。我們除大體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並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對於他們有所評論，僅僅因為他們在國家的公共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毋須諱言，我們這批朋友對於政治都是感覺興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政治」，祇是衆人之事——國家的進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權勢。同時，我們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方式，祇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公平的。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則和寬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瞭解。

但是這個刊物也不僅僅是一個論評時事的刊物。我們還有另一個在程度上估着同樣重要的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對於一般青年思想的進步和品性的修養，能够有所貢獻。多年以來，青年實在煩悶，在多年的煩悶中，意志軟弱的，漸漸趨入麻痺、消沉、及自我享樂的道路；剛强的則流於偏激。今日大多數青年，不是偏狹衝動，厲氣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們瞻念國家，中心憂惴，莫此爲甚！我們都是愛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們對於青年，一無成見，他們信右信左，儘可信其所信；而且他們能够信其所信，無寧且爲我們所鼓勵並器重者。我們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發較之思想的歸宿，遠爲重要，所以信從一種政治上的思想，必須基於理性而非出於感情；而于重視自己的思想自由時，亦須同時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條件上，我們期望每個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態度——人生的目的非僅圖一己的飽暖而實另有所寄；都有現代化的頭腦——思想的方法現代化，做事的方法現代化。我們國家一線前途，全繫於今日一般青年肩上。衝動、偏狹，强橫，都足以造亂而不足治亂；自私、麻木、消沉，帶給國家的是死氣而非生氣。我們極望這一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宅所包含的看法、態度、氣息，能給一般青年讀者以有益的影響。

二

其次，請一述我們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約：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歸，無可抗阻。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獨斷國是，漠視民意。我們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設施措置都祇是爲了一部分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民主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的最大福利爲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同時，民主不僅限於政治生活，並應擴及經濟生活；不但政治民主，並須經濟民主。

二、自由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各種基本人權。自由不是放縱，自由仍須守法。但法律須先保障人民的自由，並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則人民必守法護法之不暇。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爲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社會的福利，而自由即爲達到此種優性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會必是一個奴役的社會。我們要求人人獲有各種基本的人權以維護每個人的人格，並促進國家社會的優性發展。

三、進步　我們要求國家進步，我們絕對反對國家停滯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勢前進的國家必將遭受自然的淘汰。我們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業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業化成功，先須大家有科學精神，現代頭腦。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希望人人都有現代化的頭腦。唯有現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進步，才能與並世各國並駕齊驅，共同生存。我們反對一切的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開倒車。停頓、落後、退步，都是自殺。我們要求中國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齊着世界主流，邁步前進。

四、理性　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安定，文化不能進步。現在中國到處都是憑藉衝動及强力來解決糾紛，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動輒用武。我們完全反對這種行爲。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在這方面完全失敗。我們要求政府及社會各方面能全力注意這點。祇有發揮理性，社會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們要求一個有是非有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糾紛衝突都能運用理性來解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發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設的成功。

我們謹以右陳四義，作爲我們追求努力的鵠的，並本此以發言論事。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祇要無背於前面的四個基本原則，在這一個刊物上面，我們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獨立發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負責；而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發刊之始，謹述其志趣與立場如上。尙祈全國賢達，不吝指敎，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國家幸甚。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王芸生

我天天關心中國的時局，尤其時時在追究中國的前途。儘目前所有的資料，以參證當前的大局，我以爲中國的時局前途有三個去向。

（一）南北朝。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勝利到來之時，毛澤東先生應邀到重慶，國共談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談得攏。其中距離最遠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重劃軍區問題，另一個是關於解放區地方政府問題。到最近馬歇爾與司徒雷登的聯合聲明，使調人猶感棘手的，還是這兩個問題。這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據國共雙方於去年雙十節簽字的「會談紀錄要點」所載的第九項云：「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應公平合理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期實施計劃，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劃下，中共願將其所領導的抗日軍隊，由現有數目縮編爲二十四個師，至少二十個師的數目，表示可迅速將其所領導而散布在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八個地區的抗日軍隊，着手復員，並從上述地區，逐步撤退應整編的部隊至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這裏邊重劃軍區的計劃，實際可以說是一個江淮爲界的南北朝。雙十紀錄發表之後，毛澤東由重慶飛返延安，中共的軍事行動就轉趨積極了。在江南的共軍，迅速撤至江北。在廣大的北方，打出西的上黨區，打綏包，打同蒲東段，積極向山東擴張，大量向東北滲入。那時共軍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於樽俎的，而必得之於疆場，以實力做到其所要的。綏包之敗，山海關之挫，使這計劃受到了一些阻撓。到今年一月停戰令下，政治協商會議舉行，衣裳之會，隱蔽着戎車行動。無論停戰令下，或者政協協議，軍事實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東北更是陰雲重重，這情形一直發展到奪長春，佔濱江龍江，而到了一個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決了戰，共軍連棄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三大據點，復趨低潮，於是停戰運動大起。南京的談判，宣佈了東北停戰十五天，又延長停戰八天。這二十三天的停戰都過去了，更是大打起來。半個中國，烽火遍天，無論高潮低潮，緊打慢打，一個南北朝的運動，是在有力的進行着。這是中國時局前途的一個去向。

（二）十月革命。中共現在還沒有這麼大的野心，因爲他們的主觀力量還沒有這麼大；但是客觀的條件却在緊緊進展着。一、政治擱淺到解體。今天國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擱淺現象，懨懨無生氣。循良的公務員待遇低薄到無以維持肚皮，相對的就是貪汚公行，滔滔天下，廉潔成了難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爲，則弄到政治解體，實非不可能。二、經濟恐慌到崩潰。這問題更深刻了。今日中國的經濟，一面倒的靠洋貨輸入；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飲鴆吸毒，人民天天在掙扎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後是軍事。現在國民政府的燐光，實際是靠着中上級軍官對中共還有一股敵愾之氣。但，這是不很可靠的。因爲抗戰既經勝利，中國人打中國人，實在不能持久維持士氣，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難免要生變化。士兵一聲擺槍，中國的十月革命馬上出現，就是國家大亂。所以無論爲政府計，或爲國家計，都不能再打，都不能再拖了。再打再拖，必將更加重政治經濟與軍事三方面的危機，最後鑄成國家大亂。這可能是中國時局前途的又一個去向。

（三）政協協議之路。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原是當前中國極理想而又很藝術的前進之路。一幅國是前進路線圖，設計得原不甚差。不知怎的，剛剛簽字的協議，墨瀋未乾，便你吵我鬧，弄成一文不值，一條也不曾實行。第一步的改組政府未曾實行，至於開國民大會，議訂憲法，更加談不到了。政協的五項協議：一、改組政府；二、和平建國綱領；三、

軍事問題；四、國民大會問題；五、憲草修正原則。其中改組政府一項是要領。政協洽議的政府改組，因爲各黨派都參加，是聯合性的；用這個政府籌開國大，以制訂憲法，然後實施憲政，舉行民主大選，所以這個政府也是過渡性的。由政治協議的路線過渡到民主憲政的大路，這是中國時局前途最好的一個去向。

以上三個去向，毫不躊躇的，我們希望能夠走上政治協議的路線。現在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加速度的向「國家大亂」疾趨。怎樣避免大崩潰，大糜爛，而走上和平統一民主進步之路？我以爲其中還有幾個癥結應該注意：

第一、國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潔有效。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做到清潔有效，一切施政無例外的變質，富了官僚買辦，苦了民生，則縱使有足够的武力，能否永久維護其政權，是有疑問的。

第二、國民黨應該深刻瞭解民主憲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寬容與高度的智慧的。國民黨肯不肯接納一部中央政府受立法節制及地方均權的民主憲法，是一個很重要的心理關鍵。

第三、美蘇對立的形勢，對中國現局最爲不利，最好是解消這形勢。我們所能爲力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力維均衡，而莫一面倒。

第四，最後，需要中共將來甘心做一個民主政制下的憲政的黨。

（八、二四、上海）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對於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最近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爲今日中國經濟局勢已瀕於『崩潰』的境地；一種看法認爲今日中國經濟狀況已經改善，已經好轉。究竟這兩種矛盾的看法誰是誰非？究竟當前中國的經濟情勢是怎麼樣呢？

對中國經濟樂觀的人，會用下列幾個理由，說明當前經濟已經好轉：（一）通貨膨脹是中國經濟主要病因之一。近數月至少從發鈔的情形來說，已與過去不同：『自本年三月以後，法幣的發行額就逐漸減少，到了七月發行額便沒有增加了。』（二）近數月來財政的狀況據說已有改善，稅收逐月增加，本年內當可達到預算所規定的數字。（三）自從三月四日以來，外匯曾有五個半月的安定。據說在這個安定的匯率（即對美電匯二〇二〇的匯率）下，『對於預期的效果收獲頗宏，已往五個月內輸入物資數量既見增加，價格亦逐步低降。』（四）本年糧食豐收在望，這對於農業社會的中國將必發生良好的影響。（五）中紡公司的生產已上軌道，政府對衣料的價格已有控制的力量。（六）在若干區域以內，交通幹線（如粵漢路）已全部恢復，交通工具已逐漸增加。財政、通貨、物資、交通、物價、外匯等因素既然都有改善，則經濟情勢不是已經好轉了嗎？

我們的看法却與上述的樂觀看法完全不同。我們承認由於徵稅區域的擴大，由於進口物資的增多，今年租稅收入不只用法幣計算是大爲增加，即用實值來計算，或且對歲出的比例說，都遠超過去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一方面因爲稅收，一方面因爲處理敵僞資產（只是蘇浙皖區敵僞產業處理局每月便可撥二百億元，中紡公司每月便可解庫約一百億元），一方面因爲用低廉代價拋售國家的黃金與外匯（每月可能達數百億），財政已不再是一種百分之八十強的歲出依靠發鈔去應付的財政。國庫收入增加以後，鈔票的發行速率自然也跟着減少。抗戰勝利最初的半年間，鈔票增發額每月竟達上月百分之二十（複利）以上。自三月起鈔票的增加速率已較緩和。但就整個財政情形來說，離財政安定的境地還有很大的距離。目前財政收支絕不能說是已經『平衡』。如果敵僞資產處置完畢（包括中紡等公司都已售與私人），如果政府持有的黃金與外匯全部售完，政府不能再靠出售國有資產去渡日，則財政狀況必陷入極惡劣的境地。不但如此，現在財政還是本着過去一貫的徵課中下階層和便利既得利益的作風。雖然

在紙面上政府有許多徵收由豐裕階級負担的租稅的決議和計劃，但事實上今日的財政還是一種由中下階層負担政費的財政。這種以出售國家資產及壓迫中下階層爲中心的財政，即使能够做到收支平衡，也不能說是一種康健的財政。

關於鈔票增發率減低一事，我們當然是表示歡迎的。但在這裏有幾點應持保留態度的。（一）政府幾個月會把不少數量的軍隊運至東北，這往東北的軍隊是用流通券去支付一切支出的，這自然會減輕了法幣的負担。但這只是把通貨膨脹的一部分重担由法幣流通區域轉嫁到流通券流通區域，事實上並沒有解決了問題。（二）即使把東北的支出除外，國庫每月支出還有數千億元。我們如把所有收入的估計計算起來，七月份的國庫收入還與估計的支出相去頗遠。因此政府所作七月發行額『沒有增加』的聲明，我們不很了解其眞實含義。可能該月有若干收入（如出售敵僞資產收入）特別增多，可能該月有應該支項目已提前支付或延至八月始付款，可能該月出售美匯較多，所以吸收回籠的法幣較多，可能還有其他特殊的理由，結果在帳面上該月沒有增加發行。但只是一個月沒有增加發行還是不够的。如果政府能繼續幾個月都沒有增加發行，則我們才能承認眞是沒有增加發行。

關於物資增加，我們也承認是重要的。本年各地的豐收，必然會對經濟勢情發生若干良好的作用。中紡公司紗布的生產，確加強了政府對衣料價格的控制。一月至六月份普通進口物資依國內市價計算達三千四百七十餘億元，同期輸入救濟物資超過一千億元：這四千五百億的輸入物資對市場不會沒有影響的。但從另一方面說，由於內戰的擴大，由於民族工業的衰頹，由於整個國內生產的困難，所謂『物資增加』的話必須加以許多保留與修正。

至於交通方面，則更沒有多大的『改善』。一方面粵漢等鐵路是修復了，長江和沿海的水道是通航了，但另一方面在內戰的烽火中不知有多少鐵路被破壞，不知有多少的交通被阻斷，給果交通所受到的打擊遠超過交通所得到的改善。

要眞正量衡財政、通貨、物資、交通等因素究竟是否已經改善了我國的經濟，最好是看物價是否繼續上漲。如果財政眞的已經平衡、通貨眞的已經停發、物資眞的已經增加、交通眞的已經改善，則物價必然會下跌，或至少會停止變動的。但事實上三月以來物價不只沒有下跌，而且上漲甚猛。物價上漲率雖因地區及種類的不同而不同，但三月至七月的五個月間，各地物價上漲率平均總在月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間。物價既作這樣劇烈的變動，可見中國的經濟情勢並沒有改善。

至於外匯方面，則無論三月四日以前，或三月四日以後，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是整個錯誤的。這個政策結果（一）便利了外國消費物品大量向國內傾銷、（二）阻止了中國土貨出口、（三）打擊了民族工業和國民生產、（四）消耗了國家的大量外幣資金。這種政策絕不會改善國家的經濟的。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見樂觀的看法是沒有多大事實上的根據的。筆者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相當悲觀的。筆者認爲如果我們不是從表面上看，而是作深一層看，則當前中國經濟是危機四伏，沒有一點可以樂觀的。這可以分開幾方面來看：

首先，就各階層的生活來說，今日中國經濟是極不合理的。我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農民，目前一般農民因受戰禍、災荒、黑暗的政治、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地主土劣層層的壓迫，生活早已在飢餓線上。至於戰前的中層階級（公教人員和薪水階級），則早因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淪爲大貧。現在唯一得意的只有包括封建力量、貪官汚吏、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旣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全國中下階層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正窮奢極侈地過着一種最新式、最貴族、和最浪費的生活。今日中國「有」的階級和「無」的階級生活水準差別的程度，今日中國「無」的階級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經超過法國革命前夕法國當時的程度。一個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榮世界的人或者會自欺欺人地說中國的經濟已經改善了。但如一個人能同時見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廣大農村與一般中下階層人民的地獄般的生活，則他便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經濟需要根本的革命了。

其次，就國民生產的情形來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局勢確是十分嚴重。因爲工業先天的不足、因爲戰爭的影響，更因爲外匯和其他政策的打擊，今日中國的工業已瀕於絕境。最近雖改變了匯率（由美匯二〇二〇提至三三五〇）。但整個局勢還是十分危險的。不但工業產生了危機，就是農業生產也受到重要的打擊。所有出口物都品因外匯偏低的關係而瀕於無法維

持的境地。就是原料物品（如棉花等），也受到外貨傾銷的影響。豈但如此，在二〇二〇匯率改變以前，外國進口的牛奶比豆漿便宜，外國進口的罐頭肉類比鮮肉便宜，外國進口的橘子比四川的廣柑便宜，就是一般的農產品也無法長久維持。一個國家的生產事業全部陷入困境，這個國家的經濟怎樣能使人不悲觀？

此外再加上物價不斷的波動，內戰所給予國民經濟的致命的打擊，我們實不能不說中國經濟已瀕於崩潰之境了。

說到『經濟崩潰』，這個名詞是需要解釋的。最近有些朋友常問『你看中國經濟會不會崩潰？幾時會崩潰？』『你看中國貨幣會不會崩潰？幾時崩潰？』我的答案總是：『這要看崩潰兩字怎樣解釋』。如果「崩潰」是指「全部停頓」或「完全破產」，則我可以說中國經濟是不會崩潰的。除了一個給原子彈全部炸毀的國家，經濟（指生產消費等活動）是絕不會全部停止的。至於貨幣崩潰，則以中國目前戰勝國的地位，以中國目前的外匯資源，及以中國目前的信用制度而言，中國的法幣可能會貶值至萬分之一，以至數十萬分之一（或更小），但法幣絕不會停止做流通媒介的。但如「崩潰」兩字作深一層的解釋，如我們認為凡因經濟政策或措施的失當，致使一國的經濟分配違反社會正義，生產陷入困難境地，因而引起社會不安和政治紛亂，便是一種經濟崩潰，則中國經濟早已崩潰了。同樣地，如我們認為一國的貨幣因幣值變動過大，因而引起經濟的崩潰，便是一種貨幣的崩潰，則中國的法幣也早已崩潰了。

如果我們的分析是對的話，則在目前似和似戰的局面中經濟已早經崩潰，假使再有大規模的戰亂，中國的經濟又將要怎樣惡化呢？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七月二十九日，中美英蘇法等二十一國在巴黎舉行的和會，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和會，它的任務雖有固定限度，但其發展與結果，皆將影響其他和會，亦皆將影響世界和平。戰爭結束，必有和會，幾乎成了國際上一種慣例，而每次參加和會的國家，抱着企求永久和平信念，從事和會工作，也幾乎是歷史上的通常現象。人類是不是愚笨的？不然的話，怎麼打了戰爭，期望和平來臨，有了和平，又忘却了戰爭苦痛？二十一國和會既為此次空前大戰後第一個和會，它天然有責任來首先解答這個問題。

一　和會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倫敦舉行的美英蘇中法五國外長會議，無結果而散會。十二月，美英蘇三國根據蘇聯建議，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決定：對義大利和約由美英蘇法四國外長起草，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三國和約由美英蘇三國外長起草，對芬蘭和約由英蘇二國外長起草。俟上述和約草稿完成後，外長會議將召開和會。本年四月二十五日，美英蘇四法國在巴黎召集的四國外長會議，就是為完成對義大利等五國和約草案而召集的。那一次外長會議，從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十六日，共會議二十五次，討論的問題甚廣泛，討論五國和約問題，也討論德奧二國問題，可是結果並未獲得任何協議，而只決定了暫時休會，俟六月十五日復會。

六月十五日，四國外長會議如期復會，七月十三日閉會。那次會議有兩大成就：一是完成義大利等五個戰敗國和約草案，一是決定七月二十九日美英蘇中法等二十一國在巴黎舉行和會。

外交會議作了上述決定之後，即討論和會召集問題。蘇聯代表莫洛托夫提出反對任何將中國包括在內之一切動議的要求，更不贊成中國為和會邀請國之一。美國代表貝爾納斯說：「莫洛托夫所提排斥中國之建議，根本錯誤，並為對中國不必要而荒謬無理之侮辱。」去年十月，五國外長會議無結果而散之後，國際間盛傳蘇聯不願中國過問歐洲問題。（這一點，最近貝爾納斯在和會的演講中已明白指出）。七月在四國外長會議中，莫洛托夫果然公開反對任何將中國包括在內之一切動議，對中國做「不必要

而荒謬無理之侮辱」，十足證明蘇聯確實不願中國過問歐洲問題，也證明連這爲戰後第一個而任務又有固定限度的和會，蘇聯都不願中國站着和她平等地位參加。其實中國作和會邀請國，不見得對蘇聯有害，中國不作和會邀請國，也不見得對蘇聯有利。

凡是有關和會召集的問題，多半是有關技術的問題。如果翻閱一九四三年莫斯科美英蘇中四國宣言，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三巨頭決議，及同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協議，誰都可以看出中國參加和會的問題，應該不成問題。

莫斯科美英蘇中四國宣言第二項規定：「四國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有關該敵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之事項，均將採取共同行動。」第五項規定：「在重新恢復法律秩序與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得隨時會商，並於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國家商議，以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這兩項規定明白指出，在任何和會商討和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問題的場合中，中國和美英蘇三國具有同等地位和責任。

一九四五年法國已與盟邦共獲勝利，美英蘇三巨頭在波茨坦會議中決定，設立經常的五國外長會議，就是美英蘇中四國加上法國的外長會議，其任務即爲共同磋商與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及和平問題。去年十月在倫敦舉行的五國外長會議，就是根據波茨坦決定而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當時中國代表是王世杰部長，法國代表是皮杜爾部長。這機構的產生，指出關於磋商與處理戰後有關共同敵人及和平問題，中國和美英蘇法四國具有同等地位與責任。

去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舉行會議，關於籌備和會程序的協議，第二項規定：「俟所有此項和約草稿完成後，外長會議將召開會議，考慮對義、羅、保、匈、芬五國之和約。此會議將包括參加外長會議之五國及聯合國家中曾以實際軍事力量積極與歐洲敵國作戰之所有國家，即美、英、蘇、中、法及澳、比等二十一國。」這一項規定既明白承認中國爲「參加外長會議之五國」之一份子，也當然承認中國爲召開二十一國和會之一份子。

上述三種事實根據，皆明白載於有關國家共同公布的官方文件中。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對它們全部予以抹殺，而在外長會議中提出排斥中國之建議，我們認爲只有貝爾納斯用「根本錯誤」四字來批評，是再正確沒有的批評。

美英等國爲顧全實際上的困難，只得在妥協上求改善；結果，七月九日由法國以地主資格，發出邀柬，說明以外長會議名義，並根據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外長會議之決定，邀請美、英、蘇、中等二十國委派代表，於七月二十九日到法國盧森堡宮，參加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之和會。十日及十一日，法國外交部及駐華法大使分別通知我駐法大使館及我國外交部；九日，外長會議決，和會主席由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輪流担任。於是關於邀請國問題一場風波，由此結束。

二、五國和約草案

就國際慣例說，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和平，無論是命令式的，或是磋商式的，和約大致包括領土、賠款、及軍備問題的解決。這次戰勝國先從對義、羅、匈、保、芬五國入手的和約，和已往慣例比較起來內容相差不多。七月三十日，美英蘇法公佈草案。

關於領土。義大利放棄非洲殖民地、亞得羅亞海、及地中海東部島嶼及對阿爾巴尼亞和阿比西尼亞及在中國商務利益，並調整法義及南義邊界。非洲殖民地最後處理，留待和約生效後，四強另作商訂。的港國際管治制度的建議，留待和會決定。羅馬尼亞調整她與蘇匈二國邊界，保加利亞調整她與希臘邊界，匈牙利調整她與與南兩國邊界，芬蘭調整她與蘇聯邊界。羅、保、匈、芬四國邊界問題，容易解決，因爲她們不但是小國，而且戰前都是僅求自保的國家，並未在侵略擴張上製造領土的重大糾紛，這次領土之所以成爲問題，亦只是戰時成了軸心附庸，對鄰邦邊界上惹起一些小麻煩，而這四個小國事實上皆在蘇聯範圍之內，她們與蘇聯間的邊界問題，蘇聯早已和她們直接解決，即如羅、匈、保三國與鄰近小國間的邊界問題，也必多半在蘇聯指導之下獲得解決。只要他國無意否認或推翻蘇聯在東歐全部已成局面，四小國邊界問題的解決，置入和約裏面，不過是一種國際追認事實的手續。義大利問題較爲繁雜，她原是侵略國家，領土與邊界皆成問題，草案中分別規定放棄與調整，皆屬合理，唯因涉連過多

有些地方只能暫作有條件的解決。

關於賠款。義大利賠償蘇聯一億美元，羅馬尼亞賠償蘇聯三億美元，保加利亞賠償南斯拉夫一部分損失，數量未規定，匈牙利賠償蘇、捷、南三國三億美元，蘇聯應得二億，芬蘭賠償蘇聯三億美元。義大利等四國賠款總數爲十億美元。美英法三國未決定提出賠款要求。這十億美元幾爲蘇聯一國獨得。義大利賠蘇聯一億美元，外長會議決定義國以軍艦、製造品，及存留於奧匈等國物資，分七年償濟。其餘四國皆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蘇聯如能予她們以賠付方式上的便利，則這幾國賠款担負不算過重。如美英法三國不要求義大利賠款，或要求不超過義大利賠蘇數量，義大利賠款担負，也不算重。

關於軍備。義大利本是海陸軍力相當強大的侵略國家，草案規定其陸軍裁至戰前十分之一，海軍裁至戰前百分之一；其餘四國皆是小國，草案規定其陸軍最少三萬餘人，最多十二萬人。軍備裁至如此程度，義大利固無侵略可能，四小國也無力附和侵略。如聯合國再能盡責監督，這五國皆無發動或助長侵略的可能。

和約草案有幾點値得重視：（一）義大利放棄全部殖民地，甚爲合理。現在既有大西洋憲章，又有聯合國託治制度，戰敗國殖民地縱不能立即獨立建國，但也不該會有從一個殖民帝國轉到另一殖民帝國的壞現象發生罷？（二）在賠款方面，這次戰勝國對戰敗國有一個新作風，不太較量金錢的賠付，而重視工廠設備和物資的抵償。如果這樣作風，僅限於軍火工業，尙屬合理，否則一切搬運精光，許多國家由戰敗而赤貧，和平必受威脅，這一點，該不致被戰勝國忽視了罷？（三）草案規定五國尊重人民自由，綱舉目張，這是尊重世人公認和平原則的鄭重表示。

這五個和約草案尙須補充和修改，只要負責草擬和約的國家，能虛心接受建議，赴會的國家，又皆根據和平誠意，提出建設性意見，大家合力完成五個和約，其影響必定良好。

三　和會開幕後的爭執

七月二十九日，和會開幕，參加國家爲中、美、英、蘇、法及澳州、比利時、白俄羅斯、巴西、加拿大、捷克、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南非、烏克蘭、南斯拉夫等二十一國。在開會第一週之內，和會首先遭遇主席人選和表決程序兩個問題的爭執。主席問題，係由幾小國代表提出，他們主張赴會代表公推主席，後來有的建議每國代表輪任主席，有的建議法國代表獨任主席，又有的建議法國代表任正主席，其他四大國代表任副主席。後來決定仍按四國外長會議協議解決，大會由中、美、英、蘇、法五國外長輪流主席。主席問題解決，和會表決程序問題又發生爭執。

三十一日程序委員會開會，討論表決程序時，五國代表表示兩種相反意見：一爲蘇聯與南斯拉夫贊成接受四强所提出之程序規則，即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三分之二大多數決定（三分之二大多數即二十一國中的十四國）；一爲荷蘭、澳洲、及希臘反對此一規則，而建議採用普通大多數通過之原則（普通大多數即二十一國中的十一國）。和會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由此而起。

二日巴西代表團建議，會議決議應以普通多數決定。三日英代表團建議，和會應同時提出三分之二與單純多數票決兩種建議。中國美國及加拿大支持英國修正案。挪威贊成維持四外長原擬之建議。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反對修正案，堅持實行三分之二票決的原則。七日程序委員會開會，英國再提建議折衷案，將和會提交外長會議之建議分爲二類：一爲得到三分之二之大多數通過者，一爲得到半數以上而少於三分之二之通過者，會議五小時，以十五票對六票，獲得通過，反對此修正案之六國，爲蘇聯、白俄羅斯、波蘭、捷克、烏克蘭、南斯拉夫。九日蘇聯代表又提出恢復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之修正案，并後終以十五票對六票，遭否決。

爲什麼這次和會表決程序會這樣成問題？

這次參加和會的國家，除，中、美、英、蘇、法五國外，澳洲等十六國皆是小國。就一般國際會議情形說，小國比大國多，大國怕小國利用多數壓倒她們，總要在主席、主席團、委員會組織、及議事規程上面取得決定性地位，防範小國，這次和會情形不同，赴會國家在表決程序的爭執，也和已往不同。第一，這次和會所要成立的五個戰敗國和約草案，是美、英、蘇、法四國根據去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協議，而在今年美、英、蘇、法兩度四國外長會議中擬就的，也是經過甚多波折而完成的

和會召集，這四大國多半希望和約根據草案順利完成，而蘇聯最怕和會再遭遇波折，更怕和約草案遭受根本修改，希望五個草案能在和會「行禮如儀」方式下，全部通過。這與已往和會當場商訂和約情形不同。第二，歐洲方面戰事的結束，已過一年，事實上，大國在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勢力範圍業已形成。假若不否認美、蘇兩集團的存在，我們也不能否認美國和英國加上澳洲、比利時、巴西、加拿大、阿比西尼亞、希臘、印度、荷蘭、紐西蘭、南非共十二國，在和會中站在一邊，蘇聯加上白俄羅斯、捷克、波蘭、烏克蘭、南斯拉夫、或可再拉上挪威共七國，在和會中站在另一邊。美蘇兩集團這樣分邊站立，恐怕中法兩大國理想立於橋樑地位，也難發揮大勢力。這是這次和會另一種的特殊情形。第三，和約草案早經擬就，蘇聯最不願它們多所改動，她怕小國成羣的反對它們，更怕另一大國領着一羣小國根本修改它們，這都是消極的。倘若上述兩種情形不存在，蘇聯似應主張多數票決，而反對多數小國容易造成三分之二的票決程序，另一方面，小國似應主張她們自己容易造成的三分之二票決，而反對大國容易造成多數票決的程序。正因上述第一第二兩種情形業已存在，蘇聯堅持三分之二票決，小國堅持多數票決。實際情勢是這樣：如果用三分之二表決程序，蘇聯要阻止他國提出關於和約草案中的反對，只要在她七國的集團之外另獲一國的支持，她就可使反對者得不着三分之二制度所需的十四國票數，而草案就可不致遭遇根本修改的危險；反之，如果用多數表決程序，二十一國中的十一國就構成多數，或者美國集團的十二國可以隨時構成多數，或者美國集團中的十小國獲得一大國或另一小國支持，也可以隨時構成多數，而五個和約草案尤不能在和會「行禮如儀」方式下全部通過。七日，英國折衷建議案，在程序委員會中，以十五票對六票，獲得通過；九日，蘇聯重提三分之二表決案，在程序委員會中，以十五票對六票，卒遭否決。這兩次三分之二多一票的經驗，告訴了蘇聯，三分之二的表決程序已不大可靠，多數表決程序更危險，也告訴了反對蘇聯主張的國家，三分之二的表決程序對蘇已非絕對有利，多數表決程序範圍蘇聯則更有把握。所以，蘇聯除運用其「否決權」外，必得堅持三分之二制度，小國則堅決多數制度。這種對峙情勢，甚清楚，也甚尖銳，怪不得雙方堅持各自主張而不相讓。

四 和會展望

在大戰結束之前，美國研究和平的人士曾為召開和會問題作過種種周詳考慮。有的認為戰爭結束二三年後，召開和會，讓大家戰爭情緒減退，在正常心理條件下，為持久的和平作理智的打算；有的認為戰爭一經結束，和會立即召開，免得大家日久忘却苦痛，各個爭權奪利，無形中又埋伏破壞和平的禍根。這次在巴黎召開的二十一國和會，時間不太急促，也不過遲緩，而在歐洲方面戰事結束一年後的今日，無形中可以免去上述兩種人士的顧慮；而和會任務僅限於完成對義、羅，保、匈、芬五個戰敗國和約，先從比較簡易的部分入手，也是審慎而且合理的辦法；同時，和約草案並非在和會中臨時決定，而經由幾度外長會議，在原則與細節上，全獲得美、英、蘇、法四國一致協議，逐一完成，並決定再召集有關國二十一國代表作最後商討，且容許五個戰敗國代表列席申述意見。從這許多方面來看，這次和會召開前種種準備，實遠較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為周到，其發展與結果，應該可以令人滿意。怎麼開會第一週內，表決程序問題的爭執，就表現得這樣烏烟瘴氣？莫洛托夫和貝爾納斯二人時常作挑戰時對罵，莫洛托夫指摘美國集團企圖排斥蘇聯，而貝爾納斯有一次竟會斥責莫洛托夫「胡言亂語」。彼此不講求外交詞令，也不大重視國際禮貌，這樣外交太不「古典」了！

眞的，戰爭過去，大家忘却戰爭苦痛了麼？在這參加和會二十一國中，除巴西外，那一國沒有因這空前大戰或增加負累或遭受苦痛？美國成為「民主國家兵工廠」，在協助與領導抗戰兩方面，担負空前重大。雖遠在北美的加拿大和南非的南非聯邦，都為盟國戰爭盡了最大力量。中、英、蘇、法四大國均曾遭受侵略戰爭最大最久的直接苦痛，而法國且受過等於亡國的全部淪陷苦痛。其餘十餘國多經長期苦鬥，且多全部淪陷，阿比西尼亞亡國達十年之久。戰爭期間，這二十一國無不切齒恨惡侵略戰爭，也無不對於戰後和平寄予極大期望。現在距離歐洲方面戰事結束不過十幾個月，大家心理是改變了麼？記憶力又減退了麼？在戰爭結束前一年，拉斯基教授等著「倫敦華盛頓莫斯科，和平的夥伴」的書中前言說：「戰爭的勝利易得，和平的勝利難求。因為戰爭，大家甘苦同嘗，患難與共，集中

全力對付當前的大敵，自易暫時擱置種種較小的糾紛，從事救亡圖存的合作，但一到共同的敵人覆滅，戰爭的恐怖漸漸消失，誰又敢保證各國之間，不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現在我們可以說拉斯基教授說的話是「不幸而言中」了麼？如果小國往往識見短淺，不易瞭解他這幾句預言，難不成大國也看不懂它們麼？

揭穿的說，和會中鬧的問題，往往是大國間從中掀風作浪，今日在巴黎鬧的表決程序問題，實質上還不是幾個大國鬧出的問題。記得貝爾納斯出席和會前發表談話說：「戰後各大國間的磨擦，迄未消除，這是對和平的一個極大威脅。」爲什麼打了這次空前慘痛戰爭而又經通力合作始獲反侵略徹底勝利之後，大國間又發生磨擦？爲求和平罷？大國間不應有磨擦，因一時誤解罷？大國間磨擦也不應迄未消除。如果貝爾納斯的話是對的話，那豈不是幾個大國趁着這第一個和會召開時機，將她們的磨擦，從會外搬到會內了麼？說起來，眞够奇怪，大國能爲戰爭而合作，不能爲和平而合作，能在合作中贏得戰爭的勝利，不能繼續在合作中贏得和平的勝利。大國眞的「再斤斤計較各自的利益而忽略了世界和平的共同福利」了麼？

這十幾天和會經過，指出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即是小國似乎多重視有關世界的大利大害，而大國反而斤斤計較各自的小利小害。然而骨子裏，都是小國不信任大國，而其根本原因，則是大國間彼此不信任。小國不信任大國，絕對不肯把大國協議看做「聖經」，全部遵守，更不願把一切國際問題的解決送給大國，批上「照准」或「不准」一律奉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即或再來幾個三強四強或五強會議，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如果大國說，這次和會一切根據三強或四強會議協議來作決定，她們能够獲得小國的答復，必是「爲大國裝門面的和會根本不必召開」。大國間彼此不信任，必定擴大小國不信任大國的情勢，而大國爲應付另一大國而勾結小國，更是加強小國不信任大國的心理；反之，小國不信任大國，大國間更必因小國問題的牽連，彼此更不信任。這幾天戰敗國代表已開始列席申述意見，如果再將他們天然企圖逃避責任的情勢捲入漩渦，和會內不信任空氣必更可怕。再看九日英國在會場散發關於反對蘇聯要求德國賠款的文件，大國間更要將不信任的空氣作題外的擴張，這格外令人覺得可慮。

當前和會情勢不能說不足慮，但我們對它希望都不能寄托在幻想上面。每次和會召開，赴會代表總要發表幾次能代表民衆和平願望並能獲得他國同情的堂皇演講，這次和會既然沒有例外，我們最大希望當然寄托在這二十一國全體能够言行一致上面。一部大西洋憲章已够[illegible]」，而一部聯合國憲章尤其完善，大家皆能遵行，關於理想的好事，即如各國都能按其代表的堂皇演講，不折不扣做去，世界和平也就可有莫大保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英首相麥克唐納說得好：「吾人甯願冒和平之險，而不願冒戰爭之險。」我們希望今日參加和會的大國，首先認識他這句話要義，向遠大處着想，甯冒和平之險，不冒戰爭之險，至少先使這次和會獲得較上次巴黎和會爲優良的成功。

這是戰後第一個和會，任務雖有固定限度。影響却甚重大，究竟這二十一國是否忘記戰爭苦痛？願否誠意共保和平？能否爲謀求人類福利樹立好榜樣？各個皆要經由這個和會受着考驗。

卅五年八月十一日昆明

論知行

馮友蘭

知易行難，是向來一般人的說法。「言之匪艱，行之惟艱」，更是我們古聖先賢的遺訓。就事實上看，言行不相符底人，不拘在甚麼時候，或甚麼地方，總是多於言行相符底人。若說他不知，他何以能言？若不是知易行難，又何以能知而不能行？遇見「僞」組織中底人，若與他們私下談話，恐怕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承認他們的行爲是罪惡底。我們不能說，他們無知，我們只能說，他們的知與行不符。他們知他們的行爲是罪惡，而行不能改過來。這豈不是知易行難麼？

但三民主義中又有知難行易之說。究竟是知易行難呢？抑是知難行易

呢？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問題。陶行知先生的名字，本來是陶知行。他或者先以爲知易行難，注重在行，故取名先知而後行，後又以爲知難行易，注重在知，故改名先行而後知。究竟他的意思，確是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他把知行二字，顚之倒之，似乎表示他對於知行底看法，先後總有不同。我們可以以此爲例，以見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有這個關於知行底問題。

有許多人以爲，「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是矛盾底。如果我們要說「知易行難」，則須否認「知難行易」。如果我們要說「知難行易」，則必須反對「知易行難」。這種見解，我們以爲是錯誤底，照我們的看法，這兩個命題都是可說底，而且都是眞底。

古人說：知易行難，是就道德方面底知行說。近人說知難行易，是就技術方面底知行說。就道德方面底知行說，確是知易行難。就技術方面底知行說，確是知難行易。

王陽明說，人人有良知，能當下即分別善惡。我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知善知惡屬知，爲善去惡屬行。固然他亦說知行合一，他亦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從始到成，中間很有許多工夫，這許多工夫，即是「致良知」的「致」字所表示者。人人都有良知，而却不是人人都能致良知。這便表示知易行難了。我們雖不完全贊同陽明的良知之說，但道德上底善惡，確是人不待推論而直接能感覺到底。感覺到則善知其爲善，惡知其爲惡。在這一點，聖賢與惡人，並沒有很大底區別。不過知其爲善則行，知其爲惡則去，却是極不容易做得到底。此而能做得到，便則以進入聖域賢關了。就這一方面說，確是知易行難。就知易說，「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就行難說，「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但就技術方面說知行，則確是知難行易。一個匠人，可以蓋一所房子。他從經驗學來蓋房子底方法。用這方法，他能蓋房子。但如有人問他，爲什麼房子要如此蓋，他却不能答了。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所以能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雖行而未知。一個學過建築學底工程師則與匠人不同。他不但會蓋房子，而且知道蓋房子底方法所根據底原理。他不但知其然，而並且知其所以然。知其然者未必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者必知其然。人的知識，都先是經驗底，而後是科學底。人憑經驗底知識，即可以有行，但必有科學底知識；纔算是有眞知。不必有建築學，人即可以憑經驗蓋房子。但必有了建築學，人對於蓋房子底方法，纔有眞正底了解。就這一方面說，確又是知難行易。就行易說，「愚夫愚婦可以與能」。就知難說，「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由此我們可知，「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這兩個命題，各有其應用底範圍。如各守其範圍，這兩個命題，都是可以說底，而且都是眞底。

在技術方面，我們應當知「知難行易」，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經驗自限。對於已知其然者，還要進而知其所以然。在道德方面，我應當知「知易行難」，如此我們可以不以空言爲自足，必要使空言進而爲實事。

或者說：以上所說，把知行打成兩橛。其實知行是合一底。眞知必能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有眞知者自然能行。如此說，還是知難行易是不錯底。因爲所難者是知。如有眞知，則自然能行。

關於此點，我們說：在技術方面說知行，知難行易，本是我們所承認底。有眞知者自然能行，亦是我們所承認底。不過若在道德方面說行知，則有眞知者是否自然能行，要看所謂眞知，是甚麼意思。你可以說，凡眞知必見於行，因爲如未見於行，則其知不是眞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所謂眞知，是如此底意義，則說有眞知者必見之於行，正如說，有必見於行底知者必見之於行。此話固然不錯，但在實際上沒有多大底意義。照我們的看法，於此應當說，有眞知者，如果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必有行，以繼續之。譬如我感覺一種臭氣，這是知。如順此知之自然發展，則我必走開，或掩鼻；這是行。但有時因爲別底關係，我不能走開或掩鼻，則我即只有知而無行了。但於此我們亦不能說，我的知非眞知。

人在道德方面，對於善惡，亦嘗有所感覺；這是知。如順其此知之自然發展，則我們當然亦可爲善去惡。但稍一轉念之間，因計較利害，而即不能爲善去惡；這亦是常有底事情。所以古人說：初念是聖賢，轉念是禽獸。初念是人人都有底或都可有底，所以我們說知易。但誰能完全不受轉念的影響呢？一受轉念的影響，初念即能知不能行了。所以我們說行難。

近來很有些人誤解了知難行易這句話的意義，以爲無論對於何事，皆是知難行易。於是作了些文章，擬了些計劃，自以爲我已經知了，知難行

易，行是不成問題底。但一說到行，就包涵有技術方面底「如何行」，和道方面底「應該行」。就「如何行」方面說，計劃如果眞擬得好，自然於行是有很大底幫助。但就「應該行」方面說，當事者另需要一種決心，如古人所謂志者，纔能把知變爲行，把空言變爲實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知易行難」。古聖先賢的遺訓，我們還是要時刻念及，以自警惕的。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編者按：本文全長三萬字，就議論段落，共分五節，在本刊分六次刊完。每節標題及文內小題，均係編者所加。

作者在全文結尾處聲明：「希望讀者至少對于本文一氣讀完，不可斷章取義。」本刊因篇幅所限，分期刊完，實非得已，倘希作者及讀者原諒。

一　歷史之性質

述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不得不分兩段：一段關於過去；一段關於將來。過去是屬於歷史；將來則是一種理想。兩者性質不同，卻必須聯結在一起。目的在於使理想不落於空想而有歷史的根據。換言之，即是由過去以推測將來，則所推測的必是比較有把握些。不過所謂由過去以推測將來，其關鍵就在於對過去作何觀察。觀察一有不同，則推測即隨之而異。所以本章不能不把關於過去的歷史方面亦加以論列。

歷史之相對的可知性

在論述中國歷史以前，先須汎言歷史之性質。須知普通所謂歷史在意義上頗爲含混。有時指過去的事情；有時卻指關於過去事情之記述。前者好像是本人；後者好像是其人的攝影。這樣一說，便知兩者顯有區別。不過有時人們卻會忽略這個區別。乃是因爲本人已死，不能再出現，所以不能不把照片，畫像之類的東西即當作其本人。但同一人卻可有不同的多種畫像。於是我們便知一個畫像只能當其人的一方面，不能把一個畫像直與其人全體相等。照這樣說，便引出一個問題：即史家對於歷史的事實眞相之距離是怎樣的？因爲歷史的記載都是史家所修，史家修史卻不是完全記錄下來而無選擇。因爲無選擇把所有出現的事情完全記載起來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既必須有選擇則便不能不問：其選擇的標準是甚麼？我們對於史家修史時選擇材料的標準可分兩種：一是有意的；一是無意的，即不自覺的。先說後者。這種不自覺的就是史家在他的時代所受的思想環境之拘束。換言之，即是他在那時的「思想形態」（Ideological Pattern）把他拘束着而自已卻不知道。我所謂思想形態是指當時流行於社會，同時又爲當時社會制度所陶冶的思想及其格式而言；乃較馬克斯的定義爲廣，同時又較波格達諾夫（A. Bogdanow）的定義爲狹。至於有意的則即是所謂歷史方法。歷史方法向來包含兩部分：一是考史的方法；另一是修史的方法。中國的史學家反而多注重於修史方法。有所謂「史例」，即是修史的體裁。此外他們又提出所謂「史筆」「史識」與「史德」。關於這些，在此處不欲多說，因爲篇幅太有限了。但這三者卻充分表示修史的人的主觀色彩。「史筆」與「史德」姑且不論，即「史識」一項就十二分證明史家對於史料確有很大的棄取。這還是講有史料可供選擇，至於沒有史料而只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史家若不去特別注意，便都會遺棄。可見史料亦是有限制的。我們憑據已成的各種史以爲對於過去事情已完全知其眞相，這是很幼稚的見解。但我卻亦不主張過去事情根本上不可知。我們雖明知歷史的記載與過去的事實之間有相當的距離，但就在歷史的記載中，亦未嘗不可藉窺過去事情的樣子於幾分之幾。此說我名之曰歷史之相對的可知性。就是因爲絕對的可知性是永遠不可得的。

歷史的相續性

此外還有一點可爲此種相對的可知性之證明，就是所謂「歷史的相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乃是說過去的事情其本身雖則過去了，但其遺跡與其影響却尙留存於現在。我們由現在可以推知過去。這就是所謂以今例古。不過這個方法必須與歷史的記載相合併而使用之。換言之，即必須憑借現在的情形而證以歷史的記載，然後方可加以推想。從反面言之，卽僅憑借現在情形來作推想是很危險的。因爲古代的情形不見得完全都有其影響與痕跡直留到現在。而况愈古則愈留下來不多，以致古今頗有懸殊。但我個人却很偏重於這一方面，以爲今日史家所以缺乏推想的緣故，就在於對現在情形未得充分認識。日本某學者撰了一部歷史，完全用倒溯的敘述法。我以爲這個體裁雖不爲正統派所許可，然却深有得於此旨。就是我們要了解清末的情形，必須以民國的情形來作憑借；要了解明朝的情形，必須以清代的情形爲憑借。因爲愈近則我們愈知道清楚。我們以知道清楚的來推想那些知道不甚清楚的則必可亦多知道一些。這種倒溯法當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却有一個長處：卽是以證明於歷史之相續性以外尙有累積性。我們所以特別注意於此之故，乃是因爲歷史上的事情有相續性的方是爲我們注目之的，至於無相續性的便沒有多少歷史的價值。但歷史的相續有兩種：一爲直接的；一爲間接的。直接的大概總是關於制度，例如地方官制，民國的制度和前清的制度雖有變化而大體上究竟差不多。推而至於明朝宋朝唐朝，都可因其沿革而尋着其線索。間接的則範圍太廣了。主要的尤在於以歷史知識爲媒介。例如有一件事情，其本身雖是完全過去了，但人們却知道這件事情，或則有人模仿之再作一回，或則有人認爲教訓，力求避免。這便是這件事情有其事後的影響。史家的記載史事往往就目的在於這些地方。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家。他們總是以歷史的記載在於取鑑。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所以司馬光撰通史，名曰「資治通鑑」。不過一個事件所遺下的影響並不能完全如史家之所期望的。例如「春秋」上記載臣弑其君者有多起。在今文家解釋孔子修「春秋」之意，以爲是有所褒貶。孟子甚至於說道，亂臣賊子懼。但實際上亂臣賊子並沒有從此絕跡。而後世篡奪之風反由此而大開。曹氏能篡漢，司馬氏當然便能篡魏。這乃是模仿。所以西方人常說歷史是重演的。我想歷史之所以往往有重演之故，就是由於歷史知識爲大家所熟知，遂於不知不覺之中仍走舊路上去了。這完全是以歷史知識爲媒介所致的。這種歷史知識對於國民性之鑄成是很有力量的。不但一個民族總是要獎勵其後裔必須知道其以往的歷史，卽一個家族必總是要使其子孫能記得祖先的前言往行。這樣便把後世人們的性格加以陶冶了。這亦就是所謂相續性。

歷史的意義

另外我們還得述及史家有意建立的教訓 。我名此爲「歷史的意義」(Historical Significance)。須知把意義加於事實上，乃是史家之所爲。科學是從許多事實上抽出一個普遍的法則來；歷史則是對於每一個事件都予以相當的意義。記載事實不僅在留存其事實，乃實在於以其所附的意義宣示出來，以爲將來之取鑑。中國向來科學不發達，但史學却比較發達，因爲中國人素來就注重於後者。所謂取鑑却並不止於鑑乎一事之所以成，且亦鑑乎一事之所以敗。因此對於記載便不能不務求公正翔實。明明是失敗，不能諱之謂爲成功。中國歷史記錄之所以有公平眞實卽由於此，而其所以崇尙公正平實亦是由於這個正反兩面取鑑的緣故。根據這個理由，所以我主張我們對於中國的歷史不必太用懷疑的眼光去看。這句話並不包含說古史不可疑，當然年代愈古，其事跡愈有可疑。不過中國史家傳統的辦法既是在於取鑑，則對於僞造事實，由情理上言之，似乎不必有，亦不應該有。因爲僞造事實與取鑑之宗旨根本不合。至於把事實賦予以某種意義以後則事實的眞相便不能不有一些歪曲，這却是無可如何的。因爲我們無由將已過去的事實拿來以與史家的記錄相對照，所以作歷史的考證工作如以發見事實原樣爲目的，這是沒有太大希望的。反不如研究史家的當時文化環境用以窺見其所以作這樣的記載之故。這句話却並不包含謂除了記載的意義以外對於事實是完全不可知的。因爲我在上文已聲明了，歷史的過去事情是有相對的可知性的。姑以堯舜之禪讓爲例。以禪讓爲傳賢固是儒家的一種解釋。後來便有人疑之，以爲事實未必如此。「史通」上說：

「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讓爲疑。……據「山海經」謂放勳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

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姦雄竊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劉知幾這種議論是根據於「汲冢瑣語」，謂「舜放堯於平陽」云云。其實在以前，韓非子亦有云：

「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可見同一事實而述者賦以不同的意義，將其遷就之，乃有如此多種。我們倘專從疑古入手，從而辨別孰是孰非，實爲一件愚笨的事。有人說，堯舜以前與其以後都是世襲，故決定禪讓爲可疑。更有人說，歷史是進化的，斷不容前優於後。（見呂思勉「白話本國史」）這些議論都是由於太沒有人類學文化社會學以及西洋歷史之學養了。老實說，舜之與堯，禹之與舜，究竟是禪讓抑或篡奪，實在無可判定。我們只能說從儒家主張仁義禮讓來講，當然要把這件事認爲讓國。從法家主張性惡恃法來講，當然要說是爭位奪權。從道家主張無爲而反於自然來講，當然要以爲堯舜是鄙夷帝位，所以我們可說史上的事實往往隨着歷史記述者的思想體系而變。疑古派只知動輒謂爲後世作僞，但卻不辨爲甚麼會有作僞。若照我此說，本無作僞，只有史家以事實來遷就其意義。這種遷就卻又出於很自然的，因爲其思想體系所使然。所以任何史實都是在文化評價的系統之下的。離了文化評價的系統而謂另有獨立的事實，這是不了解歷史之性質的。不過文化評價的系統又隨着時代而變。在某一時代的文化環境可以決定其對於以往事情的歷史評價。過了這個時代，文化的需要有了變化，則對於歷史上同一的事情會有另外的看法。每一個對於歷史上過去事情的不同看法都反映當時的那個時代的文化狀況與其需要。西方學者有謂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這句話如果加以我這樣的解釋則亦有一部分眞理。但卻決不是把以往的事實都變爲現代正在當令的事實。不過我們必須把「現代」當作眼鏡，而把「古代」當作由眼鏡而透過去的視野。視野確是受眼鏡的限制與影響。所以我在上文說研究歷史應該以今推古，卻和劉知幾所謂以古方今完全不同，乃是將這一個時代的文化境況從其對於往事的記載所賦的意義與評價態度上分析出來，然後再看那個往事在前一時代作何種敘述，其敘述受前一時代的文化境況之決定是怎樣的。這樣不是撥開一切記載者所賦的意義以求事實之眞正的本相，乃正是即在記載事實的各種史家之態度上，由其相續或相反等等，藉以窺見這個事實本身在那裏怎樣的延綿下去。所不幸的就是自漢朝以後，儒家獨尊，於是史家的思想格局乃只有一個了。以後便只是以儒家的「史眼」來編歷史。我們的問題遂變爲：且看儒家的觀念系統套在歷史的事實演化上成甚麼樣子？

說到此，且暫緩解答這個問題，請再回到堯舜繼位的問題。我以爲就上述各種不同的傳說來研究，還是儒家的禪讓說比較妥當些。我說這句話並不是以爲禪讓是眞正事實，乃只是從其反面言之，所有其他諸說卻都不能成立。先言篡奪。須知篡奪是起於君主之權太尊貴，太可羨慕，而在古代卻決不如後世那樣。至於汲冢書謂放堯於平陽，殊不知相傳堯本都平陽，則「放」字便不能成立。若謂舜立丹朱而又廢之，更不合古代情形。須知古代並沒有嚴格的傳子制度。王國維先生統計殷朝的帝王，傳弟（即由兄傳位於弟）反比傳子爲多。足見傳子並未成爲一個固定的制度。則舜又何必先立丹朱呢？總之，後世所以對於禪讓說致其懷疑之故，乃由於儒家鼓吹謂純出於道德的動機。倘使我們把其故意作此善舉一層加以輕視，或可反少疑惑了。

儒家思想與歷史事實

至於問儒家思想之格局套在歷史事實上成甚麼樣子？這個問題請從兩方面來討論。第一是：儒家思想與後世事實演化是否合拍？須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一樣，都是希望復古。特兩者所要恢復的古則不同。莊子上有：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這一段話不能完全當作神話來看。須知各部落沒有被一個大部落兼併之時其各相安無事確有這樣的情形。我在「論文明與進步」一文中已提到

遲一點。我們的這樣的文明（例如有國家，有政府，有戰爭，）乃是由兼併而始。在這文明未起以前還有一個狀態。從我們的觀點謂之為未開化狀態。但假使換一觀點必以為這種狀態亦有許多優點是我們文明時代所無的。究竟文明對於人類有幸福呢，還是這個文明以前的狀態有幸福呢，亦正難斷言。而主張後者較文明狀態為有幸福的人，在中國就是老莊。在西方則盧騷亦有這樣傾向。老莊主張應當恢復到這個文明以前的狀態。近人考證謂老子必在孔子以後，從這個思想的性質上講卻必須是與孔子同時。為甚麼呢？孔子出世是在周朝統一以後封建的全盛時代已經過去了，封建自身正在那裏逐漸崩潰中。孔子對於這樣的封建末期的一切弊病必是親見親聞知之甚切。老子必亦是深知這樣的封建末期的弊病與惡劣現象。二人對於現象之不滿是相同的；而想撥開這個現象另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又是相同的。但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大約看見過古籍，對於周朝統一以前的情形知道一些。他於是以為在兼併以前的未開化狀態比較上為佳。遂主張人類必須恢復到那個渾渾噩噩的狀態。所以老子的思想是復古。孔子必是知道老子這種復古思想，相傳孔子授業於老子似乎不會無根。但孔子卻以為這個思想雖很好，然實際上決不能辦到。於是退一步，仍主張復古。但卻只恢復到封建的初期那個統一時代。所以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乃是主張恢復到周初時代的文明狀態。亦是復古。所不同的只是老子一派思想僅能變為空想，而孔子一派主張卻有幾分實現的可能性。然無論如何，儒道兩家都是錯過了時代。所以儒家思想套在歷史演變的事實上總是好像頭大帽子小，永遠有些套上不合式的樣子。因此法家乃應運而生；法家的主張比較合乎時代。迨後來秦朝統一失敗，漢朝代之而興。漢朝對於秦朝可以說是一個反動。儒家又起來了；這個儒家卻和原始的儒家不盡相同。毋寧說是把道家法家都雜拼在內。有人說漢魏以後中國思想只有混合的，這句話是有相當眞理的）。以後史家便用這樣混合的儒家思想來套在歷史事實的歷程上而想要使二者嵌合。無如事實總是溢出這些史家的觀念格局以外。但他們的觀念格局卻亦並不是完全沒有作用。此處便牽涉到一個問題：即唯物史觀的眞理與其限制是甚麼？我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中對此曾有討論。一個有「社會平衡」的社會，不僅是從本身內部決不會產生革命的思想，並且由外傳來的革命思想亦決不會因此即掀起革命。必須在實際上自已先失了平衡。社會平衡最容易發生破壞的所在乃是經濟方面的生產關係。換言之，即貧富懸殊的趨勢。所以唯物史觀在解釋革命之起因是確為眞理。但革命起了以後，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尙未建設，或即建設而仍未穩定。在這個時候卻不是專憑所謂「物質條件」就能奏功的。而必須有一套新的觀念格局，尤必須將其普遍於各人心中。由各人心中對於這些觀念以為合理，願意推行，於是新秩序乃得趨於穩定。因此我主張觀念的作用只限於在使一個新建的結構為之穩固化上。根據此理，我們遂可說歷史上所有重大變端由史家從心理方面為之記述，這便不免於錯誤，但其以此為垂訓，使後人得以取鑑，卻不是完全無用的。否則歷史便成了一個自然的演化，絲毫人力不能參加於其間了。這個態度即在馬克斯本人亦所不取。因此我們承認中國的史家採取儒家的觀點對於後來歷史的演進不無一些影響。其實不是史家的思想能致若干影響，乃只是社會上所流行的儒家思想（這個儒家思想亦不是純粹的，已如上文所言），因為其旣在社會上流行着，當然會有影響及於其當代的歷史。史家只不過為這個廣汎的思想格局所浸染而已。但照上文所說，道家儒家都是錯過了時代，何以儒家思想還會流行着？我的答案是：這卻只靠着中國有一個特殊的階級，曰士階級。關於這一點我在「知識與文化」一書中言之甚詳。務請讀者參閱之，庶可與此書所言者相發明。關於階級之討論容暫緩提，請先提出關於整個兒的中國史之論述。（下期列第二篇：中國歷史上的十個時期）

糧食的國際分配（華盛頓通信）

陳之邁

「大兵之後，必有荒年。」這一句俗語，在靠天吃飯的中國固然是經驗之談，在世界各地也是一樣的準確。

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歐洲的戰地遭遇了空前的饑荒。美國當時曾發了很大的力量去施賑。胡佛（Herbert Hoover）先生當時是急賑的主持者。他不但去救濟了西歐各國，新經共產革命的蘇俄也是他救濟的對象。至今他對此還津津樂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當中，聯合國間有遠識的領袖，特別是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早已判定了在戰爭中，糧食是一件極重要的武器，在戰爭結束以後，聯合國及戰敗國必定有空前的饑荒。饑荒可以使久經戰禍的人民遭遇比戰爭更慘烈殘酷的命運，成千成萬的人民將被餓死。同時不敷營養的人也將挺而走險，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極度的不安。

野心的政客也定將利用人民的饑荒來「增加他們的政治資本」。他們必定將利用種種動人的口號來煽動因饑餓而喪失了理智的羣衆。同時他們也將用各種方法減少糧食的生產，或使得糧食的運銷增加困難。爲達成後一個目的，破壞正常的交通是他們最有效的武器。因爲饑荒的人民越多，他們的聲勢越大，順利奪取政權的機會也便越高。

糧食缺乏的現像既經造成，保有糧食的人一定囂力囤積，抬高市價。他們也是在利用饑荒來發財。如果政府沒有方法予以澈底的取締，如果政府沒有力量來實行限價，施行公平的定量分配，野心的政客必定將利用此種弱點肆力抨擊政府，希望終於將其推翻。

但政府被推翻，政客當權了以後，他們並不見得可以解除人民的痛苦，因爲他們並不能在短期內增加糧食的產量。而且在大政治動亂之後，必定將有相當長期的不安，使得人民更不能安居樂業。新的政權爲保持其既得的地位，勢將用獨裁的手段壓制人民。極權的，全能的，法西斯的政治因而產生，重新擾亂以流血辛苦換來的和平與安全。

戰爭以後的饑荒是戰爭必然的結果。現代科學戰爭的破壞力是非常的。在戰爭中，多少壯年的農人在戰場上犧牲，多少豐足的莊園成了廢墟，多少耕牛被屠殺，多少農具種籽肥料被焚燒。這種破壞是戰後饑荒直接的原因，因爲在爭取勝利的途程中，代價是不能顧慮的。當前世界的饑荒，除了印度一地以外，都發生於戰爭最激烈的地方，雖則許多地方同時還有天災。中國的饑荒的省分，正是我們抗戰最激烈的戰場。在遠東各國中，饑荒嚴重的地方是日本與菲律賓，他們也都是戰場。惟有印度的饑荒不是戰爭直接的結果，而是因天時的關係，雖則我們不能因此而輕視其嚴重性。在歐洲饑荒最嚴重的地方是蘇聯的西部（白俄羅斯及烏克蘭兩共和國），東歐及巴爾幹各國，意大利與希臘，德國，荷蘭與比利時，法國的一部分。這些地方也多少有些天災，但人禍無疑是造成饑荒最大的因素。

反之，沒有受戰事破壞的國家現在大都沒有糧食的匱乏。美國現在已經不是民主國家的軍火庫，而是民主國家的糧倉。英國在施行嚴格統制下也可勉力維持。加拿大，澳大利，現在的產量非常豐富，中美南美各國，特別是阿根廷與巴西，更有許多餘糧。遠東方面只有暹羅一國有充足的食米可以出口。這個遠東的國家是幸運的，因爲他在戰爭中沒有受到多少直接的破壞。

× × × ×

爲了準備戰後的饑荒，聯合國採取了幾種重要的步驟。

在一九四二年間，美國提倡組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 FAO），其目的在搜集各種有關糧食生產的資料，交換有關情報，以供各國的參考。

在同年中，美、英、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亞等五國又成立了一個國際麥類會議（International Wleat Council），用意在籌議一部國際協約，目的在管制麥的生產，分配與價目。這個組織現在擴充變化中，中國也被邀加入。這個會議的原意本在對於糧食生產過剩時有所統制，現在當然有點不合時宜。

比較上最重要的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Tehabilitation Administraion 簡稱 UNRRA，我國簡稱之爲「聯總」），由五十個國家組織，用意在由國土未被敵侵佔的聯合國家，以其國家預算百分之一，用來救濟國土被侵的國家。這種救濟後來擴充到以前的敵國，如意大利與奧國。「聯總」的救濟本來不限於糧食，因爲救濟的項目共分爲（一）糧食，（二）衣料及住所，（三）農業復興，（四）工業復興，（五）醫藥，及（六）難民。但自從糧荒現象既成之後，饑荒的救濟當然成了其最主要的工作。現在「聯總」是振濟饑荒最重要的國際機構。

此外，還有一個最有關重要的機構，即所謂聯合糧食局（Combined Food Board），最近改組爲國際緊急糧食會議（International Emergency Food Council 簡稱 CEFC）。聯合糧食局本來是戰爭期間英美聯合參謀總部（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所隸的機構，當時的用意在分配世界的糧食，以供軍需。在初該局只是美英兩國政府間的機構，所謂 Inter-governmental Agency，機構本身並沒有獨立性，他的決定僅爲兩國政府的協議

，協議既成，卽分由兩國政府依照執行。協議如果不成，兩國政府仍可以各行其是。後來在美英之外，又加上加拿大一國，性質却未因此有絲毫變更。

糧食的供應既非僅此三國所能完全辦理，聯合糧食局底下因此設有十幾個委員會，如食米委員會，穀類委員會，油類委員會，魚類委員會，肥料委員會，肉類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除美英加三國爲當然委員國外，還有其他國家被請參加。被請的國家在初多爲主要的供應國，後來又加上主要的接受國。中國自上年冬間起被請參加食米委員會，暹羅印度最近亦行加入。其他委員國除美、英、加三國外，尙有法國、荷蘭、巴西、古巴等國，「聯總」亦爲其中之一員，雖則他不是正式的委員國。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國又被請參加穀類委員會，暫時還不是正式的委員國。

在初的時候，各委員會工作的方式，不但彼此很不一致，而且時常變更。大致言之，食米委員會的工作在公平分配所有的食米，使各需要國均能有相當的數量。這種分配稱爲 Allocation，各國得到了配額之後，自己到供應地方去購買。產米的國家，既接受了配額，便有義務依照配額由政府發給出口證，凡不依照配額來購買者，不論是政府抑商人，供應國政府應不發給出口證。這是委員會貫澈其決定最有効的方法。

配額的議定，以食米而言，原是每年分四期的，每期三個月。一九四六年後，改爲半年爲一期。在議定之初，各國先將其需要量提出，共同研究其數量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反覆辯論，往往得不到一致的結論。其次，委員會便開始討論同期的供應量，由各供應國報告，並與他國所自得的報告，如各國使館商務參事的報告，互相參證。第三個階段是使得供求彼此配合。這是最困難及最重要的階段，因爲配額卽在此成立。現在糧食一般缺乏，例如食米，本年上半年供應量約等於需要量百分之二十四，下半年約等於百分之五十。如何核減各需要國的數字，使供需相抵，往往可以拖延至兩三星期，每日上下午不斷的開會。照以往的成例，配額必須在委員會內決定，並且必須全體一致。假如有一兩個委員國堅不承認其所得的配額，時間可以不斷的延長。在普遍饑荒的時候，這是來不得的，因此最後只得屈服。議定配額最後的階段是決定那一地的配額應在那一處購領。這也是十分困難的，因爲各地的市價既不相同，遠近的運費相差亦鉅，同時，有的國家不要金錢而需要別的物品爲交換，所以有的配額根本不能滿足。例如中國在本年第一期配額中，有四千噸食米應自中美聖多明哥購領。該國需要食糖來交換，我們拿不出糖來，遂取不到米。

以上所說是一種很實際的國際會議，平時雖很少人注意，但其中的因素亦至爲複雜，爭論之激烈，情勢之緊張，初不亞於倫敦巴黎的外長會議。以上所說的步驟，是以食米爲例，其他糧食亦大致相同，只有穀類委員會另有一種辦法，不如食米之分配嚴格。英文稱食米的分配爲 Allocation，前已言之。穀類之分配，包括麥及麥粉，和其他雜糧，英文稱之爲 Programming 可以譯之爲支配，以別於分配。所謂支配完全是臨時性質的，大部以一個月爲一期，將各國可以出口的數量大家作一個支配。各國間對於穀類，仍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應報告於委員會，共同作一商量，也許有些調節。這個辦法比食米的分配較少統制力量，表示各國不願有太多拘束。此種方法很受人批評，但美英加三國堅持既定的辦法。這是因爲此種辦法對於他們顯然有利，尤其是對英國有利，所以迄不肯有所變更。

糧食的分配或支配，照過去的事實，十分的不公平。此種現象自上年冬間世界糧食問題緊張的時候起，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評，尤以蘇聯的批評爲甚。蘇聯也始終不肯參加各種的國際糧食組織。「聯總」的前後任署長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評。

糧食分配或支配不公平的原因很多，一般而言可以說仍是政治的。現當大戰之後，戰勝的主要國家都負有佔領戰敗國的義務，因此有維持被佔地治安的責任。他們深慮被佔國因饑荒而引起騷亂，所以總想多以糧食輸運到這些地方。聯合國當時本決定，戰敗國人民食物的數量應較聯合國爲低。但自糧食恐慌以來，許多戰敗國人民的糧食降低到不能維持生命的程度。當時的決定，聯合國人民每日的食物應能產生二六五〇加路里（Calorie卽食物所產熱量之單位），戰敗國應爲一五五〇加路里（美國人民的平均爲三三〇〇加路里）。但是德國英美佔領區中的人民有時只能得九〇〇加路里，實不足以維持生命。這種情形使得大量的食物被運到佔領區中，其他國家分配不到，自然表示不滿。

其次有幾個國家的殖民地現在有缺糧的情形，雖然這些殖民地近來的獨立運動絕不是因饑荒而起的，但是殖民的國家則總想以糧食來供應他們

，至少希望殖民地的人民不要因饑荒而遺亂。英國當然是此中最顯著的，同時和中國也是最有關係的；因為英國在遠東有很多殖民地，他們也都以食米為主要的食糧。英國的代表，在食米委員會中，對於英遠東殖民地的食米，爭棄不遺餘力。在委員會中，他又有加拿大、荷蘭、印度、為他極力支持，美國和巴西（英巴兩國間有協定，巴米必須依一定價格售英）也多為其協助，聲勢至為宏大。這種情形使得食米的分配殊不平均，並使得其他國家，尤其是饑荒的中國，所分得甚少。例如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有三千萬災民的中國全部，僅分配到四萬七千八百噸米，其中尚有九千六百噸應自中美洲購買的根本靠不住，而只有一百三十萬人的英屬香港，竟分到三萬四千噸，並且全部可以自英國佔領的暹羅起運。此外，英屬的馬來亞、印度、及其他零星的殖民地也都得到了相當的配額。食米分配之有政治原因是顯然的。

既談食米，暹羅的問題是應特別提出的。因為在日本佔領之時，日人曾將馬來亞之一部割讓暹羅，英國遂始終認定暹羅為敵國，日本投降後英遂將其歸入其東南亞總指揮部。暹羅為亞洲產米的地方，每月至少有九萬噸出口。這一大宗食米自然由華盛頓統籌分配，但是英駐新加坡的特別長官也是有調度之權的，這種調度名義上是運輸的便利，事實上則大可上下其手。例如特別長官在本年六月決定，中國應自暹羅購領之米，其中一萬噸應改向法屬安南購領。迨「聯總」代表到西貢去為中國購領，始知西貢之米大部腐敗，非經長時整理不能食用，而且最多只能得三千五百噸，其餘六千五百噸又得到暹羅去購領，且又因六月卅日上半年截止之期已到，也許根本購領不得。這種制度的偏頗是顯而易見的。

暹羅的情形還有其他方面。英國在暹羅維持着很嚴格的限價，且要以英國的物產來和暹米交換。同時暹羅的米商，大都是華僑，他們受限價的拘束，英國一時又無力以大批產品運來換米，自然不願食米脫手，他們關懷祖國，如果暹米可以大批運華，也未始不肯出售，但他們自願捐獻祖國的食米，也領不到當局的出口證。我們並不是認為捐米應當作為世界食米分配的例外，因為這是與既行制度不符的。但是現在的措施，卻委實未能顧及實際的情形，以致使得暹米不能大量湧出，來救濟普遍的饑荒，許多人將因為這種短視的政策而餓斃。這個極端不幸的結果應當是責有攸歸的。

× × × ×

鑒於各方對於聯合糧食為之不滿，美國在本年四月間，聯同英加兩國，召集了二十二個國家開會討論補救的辦法。討論的結果，決定改組該局為國際緊急糧食會議，將來會員國當可增加。此會議並設有由九國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中國也當選為其中之一。中央委員會每二週開會一次，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討論救濟世界饑荒的各種問題。全世界五萬萬饑民對於這個新的機構，一定寄以無限的期望。

然而我們對之卻不敢過分的樂觀。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新的組織是一個極大的進步。第一，他現在已是一個國際的機構，而不僅是一個「政府間的機構」。這個改變當然增加了他的力量。第二，新機構將利用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的秘書處，及其完密的情報網。在其中服務的人員將是國際的公務員，情報當然也應較以前完備而準確。第三，會議及中央委員會包括了幾個生產與消費的重要國家，基礎比較廣泛，自然也是一大進步。

然而在這個機構下担任實際工作的仍然是現有的十幾個委員會。他們的主席，秘書也許另選，各委員會也許有新國家參加，但至目前為止，其工作方式仍然沒有變更。更重要的是上述的種種有關糧食分配的政治因素，並沒有絲毫變易。這些因素既然存在，我們絕難希望有根本的改易。想來糧食的分配，在現在情形下是不會忽然變成太公平的。

在戰後的國際社會中，中國是主要的一員。在任何國際組織內，中國都有其發言權，無論一件事對中國有無直接關係，中國都有發表主張的機會。我們的主張能否被他國尊重，其中的因素至為複雜。我們不妨即以糧食問題為例，中國在爭取食米配額的交涉中，不但未能達到我們要求的數量（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供求實相差太遠），而且在比例上也較他國相差甚遠。上文說到這裏有許多政治的原因，不是徒然開會爭論所能解決的。也許是根本上不能變更的。然而我們自已也不能不說有許多缺點。

第一，我們實在太缺乏統計，為我們立論的根據。我國糧食的統計，不但不充足，而且參差太大，不易使人相信。別國知道我們現在尚沒有準確的人口統計，每人每日消費多少糧食，共得多少加路里，自然無法計算。（下接第二十七頁）

觀察通信版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

有些人希望他組織政黨 有些人主張他先辦刊物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胡適之先生二十六年出國赴美，居美九年，於七月五日返抵上海。上海市政府特派專輪接迎，並奉蔣主席電囑安為招待。教育部由杭立武次長賀師俊司長代表赴滬歡迎。胡氏抵滬後，即以「腹瀉」謝客。休息一週，於十二日由滬飛京，朱家驊、王世杰、蔣夢麟等氏俱蒞機場迎迓。胡氏在京勾留六日，寓鷄鳴寺中央研究院，酬酢甚忙，除應蔣主席宴會一次外，復共進早餐一次。

胡氏歸國後的動向如何，大家均極關切注意。歸國之日，新聞記者以來日大勢相詢，胡謂渠二十五歲生朝時，曾作一詞，末句為「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時為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迄今已三十年。他說他當時為一少年，故葫蘆裏尚有藥，今已垂老，葫蘆裏藥已盡矣云云。在京時，新聞記者以國事見詢者，胡氏輒謂隔膜，尚須「學習」，無可奉告。有些人對於胡氏的默不一言，不免失望。但就情理上說，胡氏出國多年，而這八九年中，又逢中國政治社會變化極多，複雜非常，在這種情形下，不要說胡氏，就是任何稍有身份的人，也不能不慎重發言。胡氏自謂葫蘆裏已藥盡，這是自謙之辭。葫蘆裏的藥想來還是有的。但要開出一個藥方來，也非匆促可辦之事。

希望胡氏組黨的人物

胡氏歸國後，外間即有胡氏組黨的傳說，業經胡氏公開否認，然此事非毫無起因者。這幾年來，國事日非，一片混亂。人人對於現狀表示不滿，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所懷有的苦悶，尤其深刻。當今中國，國共對壘，一般受英美傳統的民主教育洗禮的人，雖不滿意於國民黨，但亦未必贊成共產黨。民主同盟本來是超乎國共兩黨範圍之外而獨樹一幟的，在思想上，大體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份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複雜而懷着許多先天不足的集團，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現的，也未能使人滿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現在仍在不可知之列。因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國一般自由思想份子，實有急切組織一個政黨的要求。然而組黨須有領袖，這個領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比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較多；胡氏是今日中國有足够的聲望以領導羣雄組織新黨的人物。現在有幾種人都希望中國有一個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的政黨。第一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正統派的自由思想學者，第二種人是現在國內一般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種人是美國人。就中國的大局論，美國當然是要支持國民黨的，但是一方面要扶持國民黨，一方面又實在感覺國民黨的扶不起來。遠者不說，就說最近一二年，國民黨所表現的許多行為，實在使美國內心煩悶到了極點。美國方面也實在希望中國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來，來增強國家的生命，並鞏固國家的「安定之擺」。

胡氏組黨的聲望

假如胡氏出而組織，聲勢必定浩大。有極大數目的自由思想份子，包括教授及學生，均將奔投新黨的旗幟之下。這些人一方面苦悶多時，一方面又不願隨便投入任何黨派，在這兩種煩悶的環境下，如胡氏出而組黨，或能以全部熱情來參加。工商界的領袖，亦必以或公開出面或不公開出面的方式，參加協助，故在組黨經費的籌募方面，當較容易。就是民主同盟裏的少數教授派，以及國民黨裏的一些自由份子，也會脫離民盟或國民黨來參加。

胡氏個人的條件分析

然而就胡氏個人的條件，以測組黨的前途，則有可知

者一，不可知者二。可知者，即以胡氏的聲望，絕對領導得起來。不可知者，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幹，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幹。治政與治學的性質不同，所需要的條件亦不同。譬如張君勱氏，固為一彬彬有禮的長者，亦為一博學能文的學者，然而他領導組黨，數年以來，可謂無甚成就。吾人固不贊成組黨要用打手，然而單靠書生，也是不行的。胡氏如組黨，而其行政才幹不足以副之者，則至少必須能有一個核心的高級的黨的幹部，以為策劃執行的動力。第二，在大的思想傾向上，胡氏當然是領導得起來的，但一個政黨不能單靠一種廣泛的傾向來維持，尚須較為具體的綱領。今日組織政黨，若是不能有一個較為進步的政策，特別是對於社會及經濟兩方面，很難在世界的大潮流裏站得穩。今日組黨，領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黨的基礎仍在廣大的羣衆。而羣衆決不能僅靠任何一個偶像來維繫，須靠進步的政綱來維繫。關於這點，胡氏出國多年，一方面他對於中國社會隔膜，一方面中國社會對於他也同樣隔膜，故記者稱此為「不可知者二」。

先說恢復獨立評論

以上是對於一些人希望胡氏組黨的分析，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大都是從前獨立評論的舊人）以為組黨事大，不宜貿然為之，故主張恢復從前的獨立評論，（或另用一個名字亦可）先從領導言論着手。中國現在的言論界很是紊亂，並很柔弱單薄，胡氏若能主辦刊物，對於國事，亦可發生相當的影響。

CC攻勢·胡氏態度

上述二事，就是胡氏歸國後，胡氏的友好舊識所醞釀討論的事情。國民黨當局對於胡氏歸國後的動向，當然在密切注視中。胡氏甫抵國門，CC系即先來一個宣傳攻勢，宣稱胡氏回國組黨。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胡氏雖然從事外交數年，但畢竟還是書生本色，立刻公開否認，使CC的宣傳攻勢，大勝而歸。不過就胡氏本人，對於組黨事，確尚隔開一段路程，因為他離國太久，而目前的局勢又太複雜微妙，他必須有一個相當時期的冷靜觀察。至於辦刊物，當然其事還較單純。但是目下胡氏的全部精力，仍側重於北大的整頓，似尚未計及任何有關「政治」的活動。不過我們環顧當前的情形，對於這種傳說中的新政黨，可以「呼之欲出」四字形容之。

血與理想
李聞之死

求仁得仁．逝者已矣
念茲在茲．後生勉之

（本刊特約昆明通信）凡沒有到過昆明的人，聽人說起昆明的夏季，總是十分羨慕的。沒有疑問地，從天氣來說，昆明是沒有『暑天』的。雖然在重慶、漢口、京滬等地的人感覺到十分炎熱的時候，昆明還是過着一種清涼的生活。但在昆明居住的人，對於這種清涼的天氣，却不一定感覺到十分愉快。就是純粹從天氣來說，夏季雖然不熱，却先後受『風季』和『雨季』的風雨的打擊。而每年的夏天，追隨季節性的風和雨而來的，總有一些政治上的風雨。

政治風暴

在各種政治上的風雨中，最使人感覺不快的就是『黑名單』的傳說。在近幾年間，每到暑假的時候，總有一些『黑名單』的傳說。有時說聯大要辭聘曾昭掄、潘光旦、王贛愚等教授，有時說雲大要辭聘某某等教師，這些傳說有時並且刊載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但經過了夏天的風季和雨季後，這些被傳說列入『黑名單』內的教師全體都照常上課，傳說才告一段落。在今年的暑期中，又有『黑名單』的傳說了。正如今年的風季和雨季的風雨比較往年暴大一樣，『黑名單』的傳說也較以往為嚴重。此次的謠言，說『黑名單』共有四十幾個人，包括批評政府最力的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從事政治活動甚力的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去年昆明學潮發生前夕參加演講的四教授以及許多已經不在昆明和不少沒有列入黑名單

理由的人。若人並且說這次列入『黑名單』內的人不只將被停聘，而且可能會被暗殺。這種謠言大家是不相信的。因為謠言中所列的四十多人，有許多是絕不會被停聘或暗殺的。就是到了今天——李聞案件已經發生了的今天——記者還是不相信有這樣的一個四十多人的名單的。因為所有原任教職的人，今天都已收到聘書，並沒有一人被停聘的。同時許多所謂在名單內的人，我們至今還不相信會因政見的不同而被暗殺的。

風聲鶴淚

但是，無論有沒有『黑名單』，李公樸和聞一多兩先生是被暗殺而慘死了。在李公樸遇刺以前，昆明的政局便已有些波瀾。那時，開往東北的滇籍軍隊，在東北『叛變』或『投降』了一師，這一師人據說還自稱『民主同盟第一軍』。那時恰好龍雲第二公子所領帶的一師人，不顧奉命他調，自請解散。於是市面上便有許多謠言。這些謠言包括某某等黨派在滇籍軍隊方面活動，希望來一個政變和成立『民主同盟第二軍』。這個時候，教場口事件的出色人物李公樸回到昆明，於是更增加了謠言的色彩。不但如此，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出動搜查軍火，並且搜查到監察使的家裏，引起不少風波。所以在李聞慘案沒有發生以前，昆明便已風聲鶴淚了。

李案推測

在七月十一日的一個晚上，李公樸和他的太太往南屏戲院看電影，九時散場後即在南屏街口乘公共汽車。公共汽車停在青雲路大興街口的一站時，李公樸和他的太太便下車，準備回到他們居住的北門街。但同時也下來了幾個衣冠不甚整齊的人。結果在李氏夫婦沒有察覺的時候，李公樸先生便被刺身死了！據李太太說，行刺用的是一種無聲槍，否則她不會不察覺的。

李公樸這樣的慘死後，昆明市上自然免不了會起了許多傳說，通常有四種推測。一種傳說是國民黨某某等方面所指使的，例如周恩來便曾這樣的公開說過。一種傳說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主使的，報上一再傳說龍雲的三公子和此案有關，即因他是這個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一種傳說是共產黨的苦肉計，某某等親政府的報即會如此刊載。還有一種傳說是『桃色案件』。凡是認識李公樸的人都一致認為『桃色案件』是不可能的。李公樸和他的太太感情極好，他的為人也還謹慎，絕不會因男女關係而被殺的。共產黨苦肉計的說法不近情理，因為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會殺得力的李公樸。至於說國民黨指使的，這自然祇是一種懷疑，在未獲得證據前，無人敢隨便定論。至於「自由民主大同盟」是否有此舉動，也屬推測之辭。至少到今日為止，李公樸的兇案，尚在迷霧之中。

龍三公子

記者既提及「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而報紙又一度傳說李案與龍三公子有關，記者亦即順便對於為東南一帶讀者不瞭解的「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略加敘述。龍雲共有四位公子。大公子現在辦了一個報，其中主持人物很不少是和民主同盟接近的。二公子現任師長，正因他那一師的事情，現在在南京久住。三公子是一位江湖的人物，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這個『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又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呢？記者所知不多。但有三點是相當確實的：（一）這個同盟是一個雲南的地方組織，至今仍沒有出雲南境外。（二）這個同盟是很右傾的，它是百分之一百『反共』的。（三）它的分子相當複雜。龍三與李案是否有關，我們不知道。報上曾幾次說他與此案有關，但經龍雲在京鄭重否認後，即已不再有此傳說了。

瘋人瘋話

李案發生後，曾有一似瘋似癲的女人，跑到聞一多潘光旦和若干其他聯大教授住家的宿舍內說了許多『瘋話』，其中有『殺了李公樸，再殺聞一多，再殺潘光旦』的話。這不知是一種友誼的警告，還是一種惡意的恐嚇？自此瘋女人出現後，聞潘等的行動已較小心，出入至少都有人同行了。

求仁得仁

七月十五日李方家屬友人召集各界開了一個大會，報告李案經過。當時聞一多發表了一篇很富於情感而批評政府甚力的演講。他開始就說『我

是不怕死的！」他隨即向『特務』挑戰，說在場如有特務，請他站出來，給大家看看。誰想當天的下午他就給人暗殺——不，是明殺——而身死呢！

聞氏被殺前是到府甬道民主週刊社辦理一些事情，他的大公子與他同行。約在下午四時他由府甬道回到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這兩個地方相距不足一百步，以爲不會發生事故的。但在他們到達西倉坡後，即有數人向聞一多開槍，聞即應聲倒地。聞的大公子爲保護他的父親，用自已的身體蓋在他父親身上，被中五槍，因此也受了重傷。這樣地一代的國學大師和一代的大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恐怖世界

聞案發生後，昆明的形勢相當緊張。潘光旦、費孝通、等十位民主同盟的領袖和張奚若教授都避入了美國領事館。他們都受到美國領事館的招待。但他們初到領事館時，局面還是十分緊張。據說保護美國領事館的五個美國兵，每晚都守夜，保證這十一位客人的安全。

在這個時候，龍雲以前的楊副官長被捕了，主管當局正在追尋龍三的蹤跡。昆明市上的謠言很多，一度傳說許多與龍家有關的人（甚至李增天等）都被捕。事後證明這些謠言是沒有根據的。但也可見當時昆明是多麼緊張。

善後下文

逐漸地，昆明的空氣才緩和下來。中央限期破案和嚴令保護有關人士安全的命令下來了。教育部代表劉英士到了昆明並把潘光旦和費孝通保護到南京，顧祝同和盧漢主席都來了，民盟代表梁漱溟周新民也來了。

最後，聞案由中央社公布了。行刺的是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的兩個現役軍人。開審時據供是因聽了聞的演講，因不滿聞所說的話而行刺他的。據記者的推測，聞案將對行刺的兩人處死刑，李案可能沒有下落，這兩大案件或者就要如此了結了。

記者對李公樸所知較小，但對聞一多則所知較多。聞是一個研究國學深有成就的大師，他本來對政治是沒有興趣的。但是是誰使他從故紙堆中走到政治舞台？是誰使他走上反對政府的路？他是富於熱情和十分勇敢的人。他是『不怕死的』。誰又使這一位不怕死的人終受剌而身死？聞一多死後，是否還有無數的聞一多會繼續走他的路呢？

昆明已經秋涼了。是否風季和雨季都眞的過去了呢？（八月廿二日）

沉默中的潘光旦．費孝通

政府已替他們辦理赴美護照

潘光旦辭去清華教務長之職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李聞被刺後，昆明盛成恐怖世界。潘光旦教授等不得不暫避美國領使館。政府對于潘等這一着，自覺難堪，然亦不欲再發生不幸之事態，因由教育部出面，派參事劉英士飛赴昆料。潘及費孝通兩氏遂于七月卅一日偕劉氏離昆飛渝，八月二日由渝飛京。報載，「潘費抵渝，寓郊區友人處，因特殊關係與外界無接觸。」二日在中航公司爲新聞記者所遇，潘氏沉默，不肯有所表示。而在旁之劉英士氏則催促售票員：「快點，快點，新聞記者來了，趕快過磅罷。」潘氏抵京後，中央社記者往訪，潘表示：「對此案不願亂加揣測，靜待政府處理。」一月以來，潘費等氏，均爲第一版新聞人物，然渠等離昆以後，迄未與外界公開接觸，耐人尋味。潘氏抵京未數日，即離京他去，初傳已赴北平，後傳已赴上海，均不確。據最可靠消息，潘費兩氏現均寄寓蘇州，原來政府已在爲潘費兩氏趕辦赴美護照矣。有關方面希望潘費一行于護照辦妥，船期決定之前二三日，再由蘇赴滬，登船出國。潘氏本人從未想到要去美國，而其友人亦多希望渠仍留國內。又潘氏原任清華大學教務長之職，近已辭去。清華當局因潘氏在校歷史甚久，不欲其離去，因另畀以「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之職，此職爲因潘氏而新置者。查「圖書館館長」即不一定要上課，外傳今夏民盟有二十餘位教授，因政府之壓迫，被學校解聘。潘氏在清華職務之更動，是否與此有關。請讀者自行揣測之。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水・人物・藝術

（一章小說的三個斷片。時間：一九三八年春。）

卞之琳

一

未勻隨了戴天的手指，從車窗裏望去，只見山缺處天際一片平疇，溫津津的氤氳着水氣，閃耀着水光。還辨不清已經插了秧沒有，在暮春的斜陽裏，合在一起的無數水田，在震動起落的車窗裏，像喜悅的眨着眼睛。新天地就這樣招呼了遠客？

清清楚楚的記得綸年上次寄到漢口的信上報告說成都平原上八百里都是黃金的油菜花，未勻只好推測四川果然春到得早，此刻雖還只四月初，時序該算是入夏了。不錯，她昨夜在內江的旅店裏已經聽到了杜鵑。現在下午天氣就已經那麼燥熱。還只隔了一個月的時光啊！油菜花也許還嫌遠了，辨不分明，可是已經看得見烟樹了。不管怎樣，眼前一空，未勻頓覺得十分痛快，興奮得在拋上拋下的汽車裏更坐不穩了。

望見平原就高興！尤其不可解，在一個不喜歡平淡的女子。可是從宜昌上來，也確乎到現在才像第一次重新脫出了山地。

『別又進了壺中了，』未勻禁不住說出來，半站起的身子被汽車一彈的碰回了，被戴接回了原在她身邊的坐位，『壺中的天地。你看那圓圓的一片，我簡直要以爲是避秦亂的桃花源。』

『看起來都是山，』戴像跟小孩子講常識似的解釋，『四川省實在已經是一個盆地；成都平原是盆底，在古代大概是一個海底。』見未勻好像很高興他的家鄉，他很得意的接下去了：『諸葛亮還沒有出山，就先看中了這個地方。』

『可憐他以後一輩子也打不出去。』

給提起了諸葛亮，未勻卻動了傷感。她想起了小時候讀了就流過眼淚的這位老先生的兩張出師表，想起了他的徒勞的六出祁山。

似乎想不出話來辯白，戴就反問了一句：

『你還沒有進去就想出來了？』

『我聽說這里和我們的江南就已經差了一小時了。』

『你還是不欣賞我們的家鄉。』戴簡直很失望的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停了一下，他隨即像忽然抓到了一件可以制服對方的武器：『你望前頭吧，前頭還有人。』

果然有效：未勻立即又興奮起來了，望着在車窗裏跳動的遠處的平原。不錯，那塊看來十分溫潤的地土顯然有着顫動的生命，養育着無數的生命。那里雖然還望不見，早已想得見人，人所作出的種種花樣，一如綸年屢次在信上所報告的。可是，戴說了『人』就笑得那麼鬼鬼祟祟的，顯然卻就是指人中之一的綸年。又來了！說來奇怪，未勻什麼都不在乎，給提起或暗示到她的男朋友之一的綸年，卻總是有點窘。現在她就不答理，扳起面孔，只是望着車窗外，以表示了她的不高興。

她卻很高興她目前所處的地位，居高臨下，看這塊所謂『民族復興根據地之一』，在戰爭裏起重大作用的這塊土地上芸芸衆生的可憐的活動。這些小到還看不見的生物中也就有一個曾經頻頻用航空信到喬莊來給她開了一個西窗，開了一個新希望呢！可笑的綸年，他此刻也許工作倦了，正對着雲天嘆氣吧？這一下可眞像對着未勻嘆氣了，因爲他不知道，人家就在他面前的高高的山上。

『我們望見了成都平原，』未勻於是問戴說，『成都城裏人可望得見我們這里？』

『我不大記得了，』蘅回答，『我已經十五

年沒有回到四川來了。彷彿在成都城裏不大望得見山。』

『好極了，人家可望不見我！』

『誰？』藏又含有深意的微笑了。

『好極了，』未勻忽開了，『就停在這里，就停在這里！』

汽車當眞停下了。車頭上嘶嘶的冒着熱氣。大概要加水。

二

這時候成都平原又被山擋住了。未勻却很得意的發現輪年給她滿了一個四川的特色——梯田。她到了四川境內就一直感嘆了這一個壯觀：從山脚到山頂，一層又一層的疊起了一方水又一方水。人工倒當眞增加了自然美；叫人怎能不信服，從山上看了盤繞穿行在梯田之間的一灣又一灣的汽車路？即使不增加美，這些兩脚小動物有時也顯出了他們的雙手的偉大，就像進了三峽以後，她所感嘆過的束在崖半腰裏與江流並行的那條帶子，不是古代的棧道，而是較近代從石壁上挖鑿出來的車馬道。她當時在船上看了，也並沒有掩飾了她的感嘆，壓住了她的意見。

『也就像火星上的那條直線，』藏當時接了說，『人家說決非出於天然的裂縫，而是運河。』

藏就專喜歡跟她這樣的搗一點小亂。當她憑着船欄對景素描『巫山十二峯』的時候，他就從旁笑她不能把輪船畫進去，因爲她一會兒以前還正當了大家抗議着三峽裏航輪船並不曾殺了風景

『你要輪船，』未勻立即回答，『我剛才已經留了輪船的一角在你的鏡頭裏了。』

藏此刻自己在用他掛在胸前的照像機對着岸上的一個山峯，兀自出神。他幾次後悔在躊躇中錯過了美景。

『你要輪船，』未勻自覺回答得不够，又逼進一步，『輪船就在你脚底下，你自己欣賞得了。用了筆，紙上的當然應該是另一個世界。』

『我知道中國的傳統的寫景，目的還只是寫意，所以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倒有點像前些年西洋文學裏流行的超現實主義。』

藏已經照了一景，說了，已經把鏡頭轉對了未勻，要給她照一個像。

『你把鏡頭仰起一點好把我的面孔照得長一點，』未勻含笑說，『可是你把它俯下一點，却可以照進不放在我手裏的這幅畫稿上的山峯。』

因爲她沒有管超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沒有管藏究竟是不是也無非玩弄字面上的意義，忽然想起了綸年在什麼地方說過的一個理論，一半是抄襲，一半是杜撰，可是眞虧他綜合得怪有意思的：中國畫家不大平看東西，不是高山仰止就是鳥瞰。他在山底下仰起來看峯巒，就顯得非現實的那樣高聳，那樣巍峨，筆下就流露了一種昇華了的宗教情緒，一種昇華了的懷鄉病。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發揮一種超然的胸襟，如果他俯瞰了，也就是畫入了眼底——山外水，水外山。也就是得了這個法寶，中國爲小說書的插圖者也眞成了解人，甚至於超過了小說家，不讓緊閉着的朱漆的虎頭銜環的侯門隔開了府裏的燈紅酒綠和門前陪伴石獅子的瑟縮的落難客。由於他，我們讀者也就不必像小說裏樓中人那樣苦，非藉插在兩樓中間的高牆蠶處的一塘水的倒影作用，不能彼此相見。也就由於他，我們讀者無須像張生一樣可憐，要至少攀到牆頭才見到牆這一邊鶯鶯小姐也早就在悵望了……

這還總不是回答，未勻自己覺得。『另一個世界？』只能是過去的世界嗎？過去傳給了我們以一套手法，不錯，也不錯，這一套手法是多少經驗裏抽煉出來的結晶。大家說書法是中國造型藝術裏最純粹的藝術，那實在只剩了早已成了規律的一些線條的變化，一些超過了形相的姿態的變化，可是這里如何容納了執筆者各自個性的發揚！一如中國舊戲裏都有固定規律的『唱做』幫助了各有個性的演員。可是這一套如此精美的手法，即便不能應用到現實的世界，更不能應用到未來的世界嗎？這是問題。未勻眞願意誰在旁邊把這個問題接了過去。她自己是不習慣於苦惱的，她現在只好脫困以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不反對現代西洋畫，』她說，『我也並不以畫爲專業。』

『這倒又表現了中國精神，』樓教授在旁邊批評了，『中國藝術裏最推崇以眞到近於擬的努力來修養了工夫而表出之以隨興的或者淸客的態度。』

太嚴重了。未勻簡直想逃開，因爲幾乎給說出了眼淚。

三

自從在漢口那家西餐館裏和甘太太在一起的

那一晚以後，未勻第一次重新看見戴天那樣的興高彩烈。他不再無意或有意的間或提起甘太太了。從西陵峽口的南津關起，一路上他總是指手劃腳的向這些從沒有來過的外邊人炫示三峽的風景。也許除了重逢初戀的情人以外，重聞到小時候游息所在的故土的氣息也足以令人恢復青春吧？或者至少他是忘形於鄉土的驕傲了。

三峽裏的層巖疊嶂，懸崖峭壁如牛肝馬肺峽，風箱峽等在未勻都不如預想的那麼喜歡，除非它們附帶有歷史上的傳說。巫山就以它的本身倒也就引起了她的感嘆，尤其是它那些向天空伸展的奇譎的身段，即所謂『巫山十二峯』。震盪她的情感的實在還推那些水的偉構。她起初不知道所謂『急灘』，只在一定的角度裏看去斜斜的像一隻全部反羽的碩大無朋的翅膀平放在那裏，可是等輪船衝上去的時候，船兩邊就像平空添起了而且鼓起了兩隻白翅膀——激起了兩大片水花。水往往掩蓋了船頭上談話的聲音，有時候水還激起風來在話從嘴到耳朵的半途上刼奪以去。可是輪船報之以一聲輕嘯，還只顧得意揚揚的衝前去，藉了蒸氣以爲力，還是由水煮起來的蒸！

現在隨了水力的交錯的花樣，峽中彷彿充滿了喜悅。也許人自己主觀的心情發生了影響吧？未勻在樓教授偶然包小東西帶來的綸年寄到漢口的那份小刋物的一張上，無意中很高興的讀到了一位現代法國作家的一段議文，一個把喜悅當戀行的讚頌。目前的風光與一切三峽詩文裏的情調是多麼不同；如何來符合『水經注』裏錄下來的這兩行漁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啼三聲淚沾裳。

也許畢竟是冬天，水落石出了，畢竟是古代，交通工具還沒有改進，從宜昌到夔府這一段，『上水百日』，而不是現在的兩天半，所以淒苦；可是有了現代的襯托，益發悽麗動人，爲前所未有。而現在的喜悅有了歷史作背景也就不是那麼單純了。未勻想綸年又該眉開眼笑得把面孔鄒圓成一個孩子臉了，因爲他總以交通史研究者的資格而津津樂道一位現代西洋作家關於文學作品說的古今的『同時的存在』。

可是未勻只有不回過頭來想北平，南京，青島，蘇州，上海，一直向前面，才感覺到如此快樂吧？綸年在刋物上同一個地方提到那位法國作家主張，完全擺脫過去的牽絆，而就是那段引到的文章本身也就帶了聖經文字的清新的芳馥。向前面的跳躍不是至少得需要後邊起步的跳板嗎？這是問題。那位作家在同一節裏又說：『移動的天際，願就是我的界限。』現在束在峽中，未勻却感到如此的快樂呢？大概是因爲前面將有新的開展吧？不是對着空闊，而只是對着開向空闊的門或窗也另有一種喜悅，或者是更濃稠的喜悅吧？這也是問題。

哪怕倚在欄杆上，未勻覺得這些是已非弱枝所能負的太多或太大的果或鳥了。需要綸年在身邊了，把它們交給他，像交給他一件沉重的大衣。

（上接第二十頁）

第二，我們時常有糧食的投機，政府也沒有實行完密的定量分配制度，總令他人懷疑我們沒有盡力求本國糧食公平的分配。例如錫蘭這次要求食米所得獨多，一部份是因爲他的定量分配制度最好，確實證明了他[illegible]的迫切。同時，在定量分配優良的地方，糧食囤積的情形自然很少，黑市或投機也不會公行。這些都是要求糧食配額最有力的理由，中國則根本不能利用，立論自然十分薄弱。

第三，「聯總」將食米運到中國以後，往往即在上海一地消費。到現在爲止，運到中國的糧食根本很少，自然不必再轉運內地，因爲上海並不產糧。但是他人總想到我們交通在戰後還不斷被破壞，究竟那時才可暢通，全無把握，因此洋米究竟能否送到災民的口中，大成疑問。那些破壞交通的人實不知斷送了多少人民的生命，思之實覺痛心。

第四，別的國家對於糧食分配，大都有代表團，長川駐華盛頓，參加各種會議，研究有關資料，籌謀應付的方法。我們來來往往的大員雖多，大部事情却由他人兼任，時間精力，學識經驗實均不足以策應。這也是不利的重要原因。

我們以爲糧食只是國際間的一個重要問題，不過可以作爲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如果我們想使國際上說話眞有力量，交涉眞正成功，還須大加振作一番不可。幾千幾萬餓斃的災民正是這個缺憾的代價。

一九四六年七月日四華盛頓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登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大新振漂印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錨霖絲光藍布

四大天王漂布

榮譽出品

美人魚精元斜

大星球絲光元布

廠址：一廠上海梵皇渡路一一四一弄五〇號　電話二〇三八一
　　　二廠上海長壽路四六一弄一號　電話二二九一四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與仁里二二號　電話一八四一五 一二九七九
電報掛號七六〇一

華元染料化工廠

出品　飛機牌硫化元

▼品質高超　價格低廉▲

廠址：上海徐虹路二十八號
營業所：上海江西路漢彌爾大樓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上海維大紡織用品有限公司

專製紡織用各式紗管

▲創設廿餘載▼
▲行銷國內外▼
▲品質精良▼
▲艤美舶來▼

營業所　上海江西中路一七〇號二二三一二二四室　電話一〇七四六 一七八五〇
製造廠　上海虹橋路一九二弄一號